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十六

最具影响力的 外交巨擘

(下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邢春茹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0711 - 716 - 2

I. 影... II. 邢... III. 名人 - 列传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74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60 千字 印张: 110
责编: 于文海 陈晓玉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6.00 元 (全 20 册)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

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 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目 录

龚 澎	1
穆罕默德·萨达特	6
纳尔逊·曼德拉	10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4
诺罗敦·西哈努克	16
伊扎克·拉宾	22
布特罗斯·加利	25
亨利·基辛格	27
李光耀	29
吉米·卡特	32
玛格丽特·撒切尔	36
金大中	39
乔治·布什	42
菲德尔·卡斯特罗	46
奥洛夫·帕尔梅	50
胡斯尼·穆巴拉克	54
汉斯·布利克斯	57
叶海亚·汗	61
亚西尔·阿拉法特	64
赫尔穆特·科尔	68
米·谢·戈尔巴乔夫	72
鲍里斯·叶利钦	75
雅克·希拉克	78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81

科菲·安南	85
布伦特兰夫人	88
约翰·霍华德	92
李肇星	95
穆阿迈尔·卡扎菲	100
金正日	104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107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110
格哈德·施罗德	112
卢拉·达席尔瓦	115
比尔·克林顿	118
卢武铉	121
梅加瓦蒂	124
卡洛斯·阿罗约	128
弗拉基米尔·普京	131
托尼·布莱尔	135
康多莉扎·赖斯	139

龚 澎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 44 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了。

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 35 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 500 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

1913 年“二次革命”时，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风响应，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 1914 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

1914 年 10 月 10 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襁褓中的龚澎在母亲的怀抱里度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奔波于日本与南洋诸岛。

1928 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在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1933 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1938 年 9 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

工作。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据费正清称：“党的领导原来打算派她出国，后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耽搁。”无疑，这样却使龚澎更加辉煌。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

1945年春，直到已故资深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显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饿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 12 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成为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加拿大、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 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南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 号的 16 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华等人饯行，饯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3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了。”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

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革”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

穆罕默德·萨达特

穆罕默德·萨达特 1918 年 12 月 25 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伊尔·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 13 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 年，他的父亲被调往开罗，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郊的一幢小房里，离埃及国王的住处之一库巴宫不远。萨达特初步展示了他后半生一再展示的胆量，他常到皇家果园中偷杏吃。

为了未来在埃及发挥作用，萨达特决定当一名军官。尽管他的家庭没有社会地位，但他设法获准进入皇家军事学院。这所学校二度是贵族学校，但后来也开始接纳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子弟。1938 年萨达特毕业，被派往首都附近的通讯部队任职。如他后来所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为组建军官组织的活跃人物，他们要发动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萨达特上尉继续把英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德国人曾经让他到伊拉克从事反对英国人的工作，他参与了把一个前参谋长秘密运出国外的计划。由于飞机坠毁，计划失败，萨达特被逮捕。但由于缺乏证据，他后来又被释放了。

未受挫折的萨达特上尉接触了两个纳粹特工，他们常常一同出现在开罗的一家夜总会里。他们挥金如土，因而受到监视，并被逮捕审问。他们暗示同萨达特有过接触。结果，一群英国和埃及侦探及情报军官搜查了萨达特的家。虽然他自制炸弹的地窖未被发现，但他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利用充足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学会了德语。

1950 年，他在军队中恢复了原职。由于反叛军官秘密组织自

由军官团体的帮助，他不久获得了提升。这个组织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纳赛尔的领导下，其规模和权力都有了扩大。1952年7月22日，纳赛尔召集萨达特少校到开罗开会，说长期等待的起义不久就要开始，起义矛头指向法鲁克国王。有一天晚上，萨达特带领妻子去了影院。他们回家后，发现了纳赛尔留下的字条，说当晚行动已经开始，指示萨达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1973年，萨达特决定对以作战。他受到了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的批评。他认为打破由于势均力敌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掌握势态的主动权，那么情况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萨达特在接受访问时说。“已经到了出击的时候了。战斗重新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赞同埃及人有限度地进攻西奈半岛以及更多的苏联军队到达以后，萨达特于10月6日下令发起进攻。

1974年1月协议签署以后，接着是基辛格几个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现了第二个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协定。虽然1977年10月1日苏联和美国就中东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而作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叙利亚继续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到1978年1月，双方陷入僵局，萨达特指责以色列人是顽固脑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开的和谈会议上，萨达特同贝京和卡特会见，相持不下的局面才结束。经过两周的会谈，结果签署了被称为“和平框架”的协议。

在作了进一步努力之后，卡特飞往耶路撒冷，然后于1979年3月13日前往开罗，带着打破另一个僵局的和解建议。在机场会见时，萨达特当即赞同这些建议。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30年的埃以对抗。萨达特借用《以赛亚预言书》中的话说：“让我们共同合作，直到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刃，把长矛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刀的那一天来临。”

1980年初，萨达特同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举行了非决定性的会谈。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岛的三分之二已经撤空了。埃以边界宣布开放，两国互派了大使。1980年

3月，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患病，移居开罗，接受了长期居留的邀请，萨达特为此再次受到国内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国家的批评。

80年代开始以后，萨达特总统好像对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势态似乎发生了某些不利的转变。开罗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状态令人难堪；粮食、武器几乎全部依赖于华盛顿的援助，这导致人们的忧虑。通货膨胀率一年达到30%；镇压现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1980年4月，萨达特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讨论以色列移民问题。在那里，他谴责以色列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初，埃及极左的国家联盟进步党公开指责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这个党的声明说：“所谓同以色列敌人的正常化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对。”

8月3日，埃以签署了一项协定，在西奈建立一支25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维护它们的和平条约。

1981年9月9日，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地提及到国内的暴力传统和他统治时期的反对者。他对一名提了一个粗鲁问题的外国记者说：“要是在别的时代，我会枪毙你，但在民主条件下，我确实要像忍受反对党一样忍受这一切。”

也是在9月，萨达特指控十几个前埃及官员同苏联“勾结”，阴谋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驱逐1000名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大使普列亚科夫。

埃及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报道，埃及情报部门揭露一起由苏联特务和埃及宗教极端主义者、极左分子、纳赛尔分子、教师和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划的反政府阴谋。

9月末，当时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求

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萨达特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加强对大学校园的警戒，颁令对官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一次讲话中，萨达特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断言，国内无秩序状态已经结束了。他在两个小时的电视讲话中说：“各个方面或领域——街道、政府、大学、中学、工厂、国营部门、私营部门——缺乏秩序的状况全都结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萨达特的一个长期观察家艾坦谈道，他的事业可能要结束了；这位以色列参谋长、陆军中将坦率地说：“埃及存在着一些问题，萨达特总统将会离去，一切事情都将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南非最大的一块黑人“保留地”特兰斯凯。他的家族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王族中的一支，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酋长，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纳尔逊是老曼德拉唯一的儿子。12岁时他父亲病逝。此后，滕布人的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为曼德拉的监护人。

曼德拉早年在教会小学和地区师范学校学习，1938年考入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1953年9月，曼德拉在他起草的著名报告——《自由之路无坦途》一文中指出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要以更高的水平来进行斗争。他提出的具体设想就是实施M计划。当时非国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M计划，但曼德拉的主张并没有立即成为非国大指导思想的主流。非国大的领导人大多习惯于公开号召，对合法斗争抱有幻想，而对于把非国大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适合于从事地下斗争的组织很反感。加之非国大长期以来组织松散，权力分散，因此M计划的实行在50年代并不得力。

1962年8月5日，在由纳塔尔省驱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由于有人告密，转入地下17个月后的曼德拉被警察逮捕。

1963年10月9日，法庭正式开庭。

对曼德拉等领导人的审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广大黑人群众行动起来，人们情绪激奋，不允许当局杀害自己的领导人。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还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抗议活动。1964年6月9日，即最终审判的前3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

在国内群众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非当局对处置

这些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不得不有所顾忌。1964年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被告所犯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但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进行指控，不处极刑，而对所有被告处以终身监禁。

1964年6月，曼德拉被重新关进罗本岛监狱。此后，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18年。

1989年7月，曼德拉利用与前总统博塔会见的机会，正式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他提议“在非国大和南非政府之间举行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主张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以达成一致。这一主张随即为非国大采纳，并很快得到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非统组织的认可。

1990年2月11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终于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经过27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已年过古稀，明显地苍老了，但他却身形挺拔，反应敏捷，依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令世人惊叹的是，监狱的苦役和折磨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或使他充满仇恨，相反他态度温和、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人们感到，他的身上蕴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

曼德拉获释后立即来到设在赞比亚的非国大总部，并被推举为党的副主席，实际上代替坦博承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经过曼德拉的工作，党内领导层对谈判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统一，决定把工作转入国内，并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代表团与白人政府进行谈判。

1990年5月，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首次举行会晤，这是南非白人和黑人的政治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平等地坐在同一谈判桌前。南非政府同意消除谈判的障碍，释放政治犯，保护流亡的政治犯，与非国大共同努力结束城市的暴力活动。同年8月，非国大同意终止历时30年的武装斗争。1991年6月，南非议会废除了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集团居住法》、《土地法》和《人口登记法》。

1991年以后相继与保守的黑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兼克瓦

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布特莱齐、激进的黑人解放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奎图举行会谈，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政治解决进程中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样做不仅大大有助于协调黑人内部的谈判立场，而且促成了1991年10月各主要民主力量的大联合——爱国统一战线的成立，其中包括绝大多数黑人政党和组织，白人民主党和有色人工党等，从而增强了民主力量的谈判地位。1991年12月20—21日，代表不同种族，部族利益的19个主要政党和南非政府召开“民主南非大会”，共同讨论南非的政治前途。这成为南非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3年6月，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运用“足够多数”的原则，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9月9日又取得重大突破，达成了关于在年内成立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协议。11月18日，经过2年多的艰苦谈判，多党谈判委员会终于就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达成了协议，它标志着南非已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也宣告南非长达300多年的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南非和平进程进入了全民大选活动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曼德拉还不断密切与德克勒克的合作，相互配合，共同解决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充分展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广胸怀与高超的斗争艺术，而德克勒克也显示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由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种族和解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们于1991年、1993年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博瓦尼争取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2月16日，非国大对极右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已经同意考虑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修正案，但仍反对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在大选前夕的4月19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又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签署了《和解与和平协议备忘录》，因卡塔自由党宣布将参加大选，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则承认祖鲁国王祖韦利蒂尼为祖鲁族纳塔尔地区的传统君主，并立即为此修改宪法。对右翼势力做出的重要妥协充分

反映了曼德拉对于在南非实现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所具有的理想与信念。

1994 年 4 月 26—28 日，所有种族参加的大选如期举行，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大选中获总有效票数的 62.65%，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5 月 9 日，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新大选产生的议会中当选新南非首位总统，他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10月10日，他当选连任，第二任期于1987年1月1日开始。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20年1月19日出生于秘鲁的利马。他于1940年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1944年开始担任外交工作，先后担任秘鲁驻法国、联合王国、玻利维亚和巴西大使馆秘书及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德奎利亚尔于1961年返回利马，翌年升任大使，先后担任法律司司长、行政司司长、礼宾司司长和政治事务司司长。1966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副部长）。1981年，他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大使。他是秘鲁出席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代表团成员，也是出席大会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届会议代表团成员。1971年，他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从那年起到1975年，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大会各届会议。

1973年和1974年，他代表秘鲁出席安全理事会，于1974年7月塞浦路斯事件发生时担任安理会主席。1975年9月18日，他被任命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担任该职直至1977年12月返回本国外交部为止。

1979年2月27日，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1981年4月起，他除担任此一职位外，并兼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个人代表。他以这个身份，在那一年4月和8月访问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便继续进行秘书长在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

1981 年 5 月，他再次返回秘鲁外交部工作，但继续担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代表，直至他于那年 12 月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为止。

他还担任过秘鲁外交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和秘鲁空战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外交法手册》（1964 年）。

在其职业生涯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获 25 个国家授勋。1987 年 10 月，他因促进拉丁美洲的合作而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1989 年 1 月，他获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奥洛夫·帕尔梅促进国际了解与共同安全奖。1989 年 2 月，他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促进国际了解奖。

诺罗敦·西哈努克

诺罗敦·西哈努克 1922 年 10 月 31 日生于金边，系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的后裔，已故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之子。

他早年曾就读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和法国巴黎，1941 年 4 月被王位委员会推选为国王。1946 年至 1948 年，他在法国索缪尔骑兵军事技术及装甲兵学院接受高等教育。1952 年至 1953 年，他以柬埔寨国王身份向法国提出独立要求，并于 1953 年 11 月 9 日使柬埔寨获得完全独立。

1955 年 4 月，西哈努克将王位让与其父苏拉玛里特后，开始组建“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该联盟主席至 1970 年。

1955 年 4 月，他代表柬埔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宣告柬埔寨为中立国。

1955 年至 1957 年，他 3 次出任柬埔寨首相兼外交大臣，并于 1956 年 2 月至 9 月任柬埔寨王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56 年，他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签署了不结盟运动宣言，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之一。1958 年 7 月，他再次出任柬埔寨首相。

1960 年其父逝世后，西哈努克宣誓就任国家元首。

20 世纪 70 年代，柬埔寨发生了历史性的悲剧。1970 年 3 月，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鼓励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亲美叛国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

在此期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波尔布特也秘密来华访

问。由于各种原因，他没能同西哈努克会面。周总理在会见波尔布特时表示，柬埔寨共产党应从国家前途出发，共同反对敌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回国后，波尔布特马上召开中央会议，并以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向西哈努克发来信函，表示愿同柬埔寨各派组织进行合作。

在中国的力促下，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于1970年4月24日在广州举行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议。我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先期到达广州做准备，把会议地点确定在珠江畔的珠岛宾馆。参加会议的有越南总理范文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柬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来到广州，同三国四方领导人进行了重要会谈。他提出五项建议：揭露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阴谋；印支三国人民要团结一致，争取独立和平，谴责朗诺进行政变，支持西哈努克为首的政权；印支三国要相互尊重，加强团结，和睦相处；呼吁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三国领导人纷纷发言，支持周总理的主张，最后他们达成了《印支三国联合声明》。当晚，周总理在为他们举办的宴会上说，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也是印支三国的可靠后方！

会议结束后，西哈努克回到北京。那天正逢五一节，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西哈努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亲切交谈。西哈努克详细介绍了三国四方首脑会议的成绩，并真诚地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毛主席说：“您不要这样说，我们欢迎你们常住北京，支持你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协助你们的救国事业。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哈哈大笑地说道：“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西哈努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的方针，得到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支持。柬国内各派也十分赞赏，一些重要

人物和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来到北京。

1970年5月4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多次讨论，通过了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举西哈努克担任阵线主席。随后，民族统一阵线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推举西哈努克继任国家主席，宾努为内阁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通过了12位内阁成员。为了避免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是流亡政府，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另一部分设在柬埔寨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战略和军事斗争。

柬埔寨在北京成立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处办公地点。最后选择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当年7月，民柬团结政府搬进友谊宾馆，柬埔寨国旗在门前高高升起。在为此举行的仪式上，西哈努克激动地说：“我衷心感谢周总理为我们政府安排了办公楼，这是民柬政府的大厦，面积很大，庄重豪华，比我们金边政府的办公楼还大，我们政府在此工作必然顺利。”周总理表示：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在北京成立团结政府，并决定每年向他们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并提供警卫人员和汽车队。

西哈努克及其家属流亡中国以来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但是，当时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也在钓鱼台常住，警察密布，戒备森严，使外宾有所不便。为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个新住址。几年前西哈努克访华时，曾住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那是清朝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

1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从钓鱼台搬迁到此处。外交部还在东面一座小楼上成立了接待处，协助西哈努克工作。

西哈努克和家人搬进东交民巷后，周总理和夫人到此亲临看望。他向西哈努克表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几天之后，一位西方记者到此宾馆采访西哈努克。记者问：“您是柬埔寨亲王，又是佛教人物，

您在中国成立了流亡政府，您也想充当中国的傀儡吗？”西哈努克激动地怒斥那位记者：“你胡说八道！我绝不是中国的俘虏，更不是中国的傀儡。我在中国长期留住的原因是，中国支持我们反抗美国侵略，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另一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尊重的好朋友！”

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为支持他们的和平解放，中国政府同民柬团结政府每年都签署无偿军事援助的协议。当时，由于柬埔寨伪军控制着交通要道，中方运输武器准备的惟一通道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道路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全长1200多公里。周总理得知此项工程，便派方毅赴越南考察。经过多次踏访和会谈，中越双方达成协议。周总理决定，中方要同越方全面合作，进一步改建和扩建“胡志明小道”。随着道路的开通，车辆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五天，中国政府派军事人员把武器装备和援助资金运送到柬埔寨。最初运输车辆只有几十部，后来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从北京经过越南河内，经过这条“胡志明小道”回国。

1974年4月17日，民族统一阵线在柬埔寨取得全面胜利后，他就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1976年4月，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1975年4月17日，朗诺伪政权被打败，首都金边获得了彻底解放。

1975年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国。

毛主席和周总理嘱咐当时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为西哈努克及其家人送行。西哈努克十分感谢地说：“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慷慨的、兄弟般的、无条件的、多形式的支援，使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相信，今后中国仍然是我们柬埔寨的头等支持者！”在回国前夕，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歌词中写道：“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

衷心热爱你，把你当作我的第二祖国！”

1981年3月，他成立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并亲自担任主席至1989年8月27日。

1982年7月9日，他就任民主柬埔寨（1990年2月3日改名为柬埔寨）主席。1991年7月17日，他被推举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23日，他率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巴黎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定”。11月14日返回金边后，他被柬埔寨四方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

1993年6月14日，柬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3月18日违宪政变前的一切权力和地位，并授予他国家元首的所有权力。同年9月24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同日，王位委员会一致选举西哈努克为国王、终身国家元首。2004年10月6日，西哈努克国王发表告同胞书，宣布由于健康等原因决定退位。

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他曾先后创作了《怀念中国》、《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和《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赞颂中柬友好的歌曲。他也曾多次慷慨解囊，向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捐款。

1999年4月30日，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西哈努克国王在莫尼列王后的陪同下到中国昆明出席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西哈努克1952年4月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结婚。他们生育了诺罗敦·西哈莫尼国王和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

充满传奇色彩、先后两度登上王位的西哈努克尽管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多种疾病，但目前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家事、国事、天下事，西哈努克仍事事关心，时常通过宫廷月报和网站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在柬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明争暗斗出现危机时，也都是西哈努克及时出面调解，打破僵局，并因此被柬埔寨国内誉为“民族和解之父”。

2002 年 11 月，东盟“10 + 3”首脑会议在金边举行。热情好客的国王在会议之余在王宫设盛宴招待来访的各国首脑。那一晚的王宫灯火通明，充满了欢歌笑语。西哈努克在舞会上特邀两位女元首——梅加瓦蒂和阿罗约跳起了华尔兹。他舞姿翩翩，舞步轻盈，震惊四座。晚会持续了 4 个多小时，国王除了微笑着热情招待来宾，还即兴演唱了十几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博得满堂喝彩。云升首相说，“这次东盟首脑会议如此圆满，尊敬的国王功不可没”。

伊扎克·拉宾

伊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1937年，拉宾考入了卡杜里农业学校。聪明好学的拉宾第一学年就得了头等奖学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投笔从戎。1941年6月，拉宾参加了左翼犹太人组织领导的秘密武装哈加纳的帕尔马契，曾同英军一起转战叙利亚和黎巴嫩。1945年，拉宾成为帕尔马契第一营的训导主任，他在一次营救关在海法市的200名犹太移民的行动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组织才能。

1948年5月1日，有“以色列之父”称号的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翌日，阿拉伯联盟5个成员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遂告爆发。年仅26岁的拉宾被任命为帕尔马契新建的“哈雷尔旅”的上校旅长，在耶路撒冷前线作战，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拉宾作为以色列军事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罗德岛与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停战谈判。此后，拉宾步步高升。1950年，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两年后被送到英国坎特伯雷皇家参谋学院深造，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补上了重要的一课。回国后出任军训部长。1956年4月又被任命为北方军区司令，军衔晋升为少将，1964年1月拉宾实现了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到总司令的愿望，担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荣膺中将军衔。

“六五”战争后，拉宾随即退役从政。1968年，总理梅厄夫人任命他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官位虽不高，但其份量则是实在的不轻。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中，拉宾开始有些不适应，他尽可能使自己融于优雅大度、文质彬彬的环境中，可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是觉得这位将军大使过于冷峻和严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拉宾的智慧、魄力对美国政治好奇以及他那外向的妻子的魅力，很快就在华盛顿成为新闻人物。

几年的大使生涯，无疑使拉宾眼界开阔不少，学到了很多枪炮以外的东西。1973年，拉宾被召回国。次年出任劳工部长，很快成为工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时对政治还不是运用自如的拉宾，却在一个偶发事件中“捡”来了一个总理。1974年6月，梅厄政府因“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而引咎辞职，52岁的拉宾战胜西蒙·佩雷斯，当选为工党领袖并被推上总理宝座，成为以色列最年轻的总理。

1975年8月底，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与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数小时的谈判后，匆忙赶往以色列，虽然天色已晚，但拉宾总理却坚持要与基辛格会晤，精疲力倦的基辛格在拉宾的办公室同他讨论了一整夜。拉宾的策略使以色列如愿以偿：美国承诺不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谈判，以色列获得了约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一个最先进的F—16战斗机中队。

1977年4月辞去工党领袖和总理之职。一个月之后，工党在大选中败北，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主宰了以色列政坛。

这次辞职并没有给拉宾的政治生命打上句号，下台后的拉宾不甘寂寞，作为一名议员仍热衷于政治活动，更不忘等待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1980年拉宾竞选工党领袖受挫。1984年，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拉宾又重操旧业，作为工党第二号人物出任国防部长。其“鹰爪鸽派”之性，再现于众。1985年，他力主对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采取断然镇压政策，同时又向政府建议并实施了从黎巴嫩的部分撤军计划。

拉宾尽管年逾六旬，但他希望再度出山的雄心不减，目标先是工党领袖之职。光阴荏苒，已是1993年2月，意志坚强的拉宾又夺回了被西蒙·佩雷斯稳坐16年的工党第一把交椅，准备在同年6月的大选中，同政治对手沙米尔一决高下。

1993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揭晓，工党领袖拉宾击败执政的利库德集团领袖沙米尔，再度出山，荣登总理宝座。

拉宾领导的工党这次所以能赢得大选，在于其提出一套比较现

实的竞选纲领。诸如对内把解决失业问题置于首位，停建犹太人定居点，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拉宾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对中东问题采取现实的灵活的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给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舆论普遍认为，拉宾也许是以色列和中东获得和平的最大希望。

的确，作为涉足政治多年的政治家，拉宾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作为中东“六五”战争赢家的统帅，拉宾现在却主张把“大以色列”的呼喊搁置一旁。

早在竞选总理期间，这位政治家就许诺在6—9个月内让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实现自治。上任后两个月他就宣布要释放8000巴勒斯坦犯人，为在华盛顿的阿以和谈，创造了一种和解的气氛。1993年1月，以色列议会取消了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此后，双方在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斯的安排下，在奥斯陆秘密会谈。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底盘还是拉宾许诺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同年8月底，巴以经过14轮会谈的煎熬，终于达成了“加沙——杰里科实现自治的初步协议”。9月10日，拉宾总理签署了久有深远意义的文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实现在华盛顿签订“巴以和平协议”，打开了最关键的一道“铁门”。

1994年2月，希布伦清真寺的残案，再一次以血的事实告诉拉宾：对已经草签的“巴以和平协议”要真正付诸实施是何等的艰难，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西方有些舆论把拉宾称之为中东和解的“总设计师”，此番评论是否贴切，自有后人公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拉宾不但从理论上构筑中东和平的蓝图，而且在实践上不停地为之奔忙。因为，他很清楚：中东和平的历史车轮不可逆转，“和”才是真正的出路，“和”是希望所在。

布特罗斯·加利

1992年1月1日，布特罗斯·加利成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开始为期五年的任期。1991年12月3日大会任命时，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这一职位自1991年5月开始。1977年10月至1991年，他担任外交国务部长。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作为一位外交家、法学家、学者和著作丰富的作家，长期从事国际事务。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并自1980年开始，为国家民主党秘书处成员。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从1979年至1991年，他担任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以前曾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他担任过许多与他的法律、国际事务与政治学等背景有关的专业和学术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各机构的成员身份：国际法研究所、国际人权研究所、非洲政治学会和伦理和政治学院（法国科学院，巴黎）。四十多年来，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参加过以下各领域的许多会议：国际法、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殖民化、中东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少数族裔和其它少数人的权利、不结盟、地中海区域发展和非洲—阿拉伯合作。

1978年9月，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出席了戴维营首脑会议，参与谈判埃及与以色列之间1979年签订的《戴维营协议》。他多次率领埃及代表团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以及法国和非洲国家元首的首脑会议。他又担任过埃及出席大会1979、1982和1990年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区域组织的研究。布特罗斯加利先生1946年获开罗大学法学士学位，他还得到过巴黎大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公法等

不同学科的文凭。

1949 年至 1977 年，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担任开罗大学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授。1974 年至 1977 年，他担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其它专业和学术活动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富布特研究学者（1954 ~ 1955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3 ~ 1964）；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1967 ~ 1968 年）。他曾在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各地大学讲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自 1965 年起任埃及国际法学会主席；自 1975 年起任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自 1978 年起任海牙国际法学院行政理事会理事；自 1978 年起任世界和平学会科学委员会成员（法国、门通）；自 1979 年起任国际事务研究所（罗马）准成员。从 1971 年至 1979 年，他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公约适用和建议委员会成员，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还创办了刊物“AlAhraMLgtisadi”，1960 至 1975 年任编辑；还创办季刊“AlSe-yassaAlDawlia”担任编辑工作直到 1991 年 12 月为止。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著作的一百多种出版物和许多论文的内容涉及区域和国际事务、法律和外交以及政治学。

亨利·基辛格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费尔特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外交家，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尼克松和福特总统国务卿。

基辛格童年时代是在德国的巴伐利亚菲尔特镇度过的。他本来应当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1930年时，希特勒的冲锋队开始在费尔特市进行反犹活动。基辛格是犹太人，基辛格一家因此受到歧视和迫害。1938年，希特勒的反犹活动愈演愈烈，基辛格全家迁往美国纽约，因而躲过了后来许多犹太人遭受的灭顶之灾。

基辛格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来到美国后，他们把基辛格送到乔治·华盛顿中学上学。但是，由于是德国难民，所以基辛格还得在一家毛刷厂做工。当基辛格进入免费的纽约市州立大学夜校学习会计时，他白天还得在工厂干活。不过，基辛格并没有抱怨，而且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基辛格的学生生活。1943年，基辛格入伍，同年6月加入美国国籍。1944年，基辛格认识了克雷默，这个人是美国政府军政问题顾问，也是一个德国人。当1946年基辛格退役后，克雷默劝他到全国最好的大学去深造，基辛格接受了。

1947年春，基辛格申请进入哈佛大学。在这所著名学府中，基辛格深居简出，如饥似渴，埋头苦读，并得到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老教授的指导，学习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由于成绩优异，基辛格被获准从本科直接升为研究生，并开始研究国际问题，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研究国际事务的学者。在研究生阶段，除了埋头学习外，基辛格也积极参加多种实践活动，后来还创办了一份杂

志，这些经历充分锻炼了他的才能。

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导师推荐进入对外关系协会中任职。这个协会虽然是一个非官方团体，却被人称为“真正的国务院”因为该协会是美国政府的智囊。1955年3月8日，基辛格接受了这个职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持怀疑态度，该协会立刻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基辛格发表文章批驳了这种战略思想。1957年，他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提出“有限核战争”的思想，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美国，许多参议员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翻阅，基辛格也因此成为美国战略政策的主要权威，成为一位国际闻名的国际战略家。哈佛大学立刻聘请他担任政治学讲师，1962年被提升为教授。

1960年，肯尼迪总统上任后，任命基辛格担任政府顾问。1969年，尼克松又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希望他能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打造成一个精干的外交专家班子，成为尼克松政府决策层中的关键人物。

鉴于基辛格的重要作用，1973年9月，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针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基辛格提出“连环套”的思想，认为在核时代，一个大国是不可能征服另一个大国的，所以美国必须谋求“相对安全”，而这必须依赖于双方的合作和平衡。根据这种思想，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在中美关系上。以及在美苏关系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卡特总统上台后，基辛格辞去了国务卿一职，但马上被聘为乔治敦大学的教授，还兼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以及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继续发挥着政治影响。

李光耀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家族已在新加坡居住了一百多年。祖父李云良是一位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老华侨，他决心要让后代子孙受到教育，日后成为与英国人平起平坐，光宗耀祖的人；父亲李清坤是壳牌美孚石油公司的雇员，为了使来到人世的儿子在人生黑暗历程中受到安慰，给他起名光耀，蕴含“光明普照”之意。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光耀便远渡重洋，到英国求学。在伦敦，他已经作为一个有左派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而受到注意。1950年8月1日，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港务局的人立即盯住了他。确实，通过抗日战争洗礼，通过剑桥大学政治和理论熏陶的李光耀，回来后就渴望登上政治舞台，雪洗殖民主义者的耻辱。法律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耀选择了以法律为武器的斗争道路。回国后，他开设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积极投入到反殖民运动中去。他斥责“紧急法令”授予英国行政当局为所欲为的权力，组织工人、学生开展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活动，要求废除“紧急法令”。到1954年李光耀准备成立人民行动党前，他担任着一百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他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邮政工人罢工背后的法律智囊，引起公众的注意，很快成为一个“民族主义领袖”。从李光耀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达39年就可以得到证明。

西方舆论把人民行动党归结为亲共的左翼党，作为领袖的李光耀基本上否定了这一看法。他表示人民行动党是一非共的社会主义党，信奉“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目标是“用和平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

人民行动党成立后，开始影响着新加坡的政治舞台。1955年，该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获得31个席位，并积极利用议会

讲坛，为新加坡的彻底自治而奋斗。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经过艰苦斗争，迫使英国同意更改宪法。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和新加坡政府。该党在51个议席中夺得43席，成为获得执政的第一大党，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光耀出任新加坡地方政府总理，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在李光耀的领导下，人民行动党作为第一大党和单独执政的地位没有动摇过，一直保持到今天。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可是，在人民行动党威望的顶峰时期，该党甚至获得了议会的全部议席，或者仅有一、二个席位被别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得，这在一个议会制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种罕见的政治现象。

1962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号召新加坡人民投票支持成立马来西亚。同年9月，71%的公民对此投了赞成票。翌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布成立，新加坡成为该国的一个州。但是，在这一新国度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预料不到的乌云。在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的过程中，马来亚极端主义分子挑起了一连串的种族集团骚动，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领导人甚至宣称：要把李光耀送进监狱。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愈来愈为马来西亚的前途担忧，觉得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未能得到公平对待。1965年，李光耀在新年献词中警告：如果1964年的错误在1965年重犯，马来西亚很可能由于内部分裂而解体。随着马来西亚内部局势的紧张化，事实终于被李光耀言中。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宣布“新加坡为一个民主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年9月21日，新加坡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次月，新加坡被接纳为英联邦第二十二个成员。作为新加坡主权国家的缔造者，李光耀以第一任中央政府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新加坡开始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这位总理首先告诫他的国民；新加坡要生存唯一的办法是“刻苦干练”四字。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其中瑞士就是好例子，他们土地不多，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可是他们出产的纺织品却可以跟“英国兰开夏”的任何产品相媲美；他们出产的药品赶得上美国的任何货色！他们只靠人才、计划和努力来生存。我绝对

不怀疑，只要有计划、有胆识、有才干以及不断奋斗，就一定要有收获和报酬。

精英主义是李光耀治国的重要观点和策略之一。他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特别是新加坡这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小国，假如不以发掘人才为重，把有潜力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新加坡将会有麻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培养政治上的梯队，顺利完成接班工作。此外，又重视把工作素质和道德品质兼备的人分配到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并大力培养、扶植科技、教育人才。欢迎世界人才定居新加坡，极力搜罗栽培精英人才。赞扬外来人才对新加坡的贡献，吸纳移民解决人才荒，并同私人部门争抢人才。

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民族之间能成功和谐相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所产生的作用。李光耀在新加坡人的文化与价值观问题上，注重东方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儒家思想对解决现代诸问题有极大帮助，他还强调语文与沟通思想的重要关系。在教育上，李光耀的双语政策，确保了新加坡人能以英语作为各族的共同沟通语，又能同时掌握母语。李的政府积极推行讲华语运动，加强华人社会的凝聚力，用华语传授传统道德观念，如儒家思想，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维持三代同堂，重视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藉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于新加坡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到1990年11月为止，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唯一的总理。如果把作为任州总理（当时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他在这个岗位上共任职31年。如从该国独立之日算起，也有整整的25年。

1988年，人民行动党在议会大选中获得决定性胜利后（只1个议席被他党夺去）不久，党的领导集体决定，选择第一副总理吴作栋为李光耀的接班人。1990年11月27日，在李光耀67岁生日过后两个月，他就决定把权力交给第二代领导人。这样，47岁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接任他的“政治导师”李光耀的班，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二任政府总理。

吉米·卡特

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可以在总结自己的政绩时聊以自慰地说，在他执政期间，“不曾有一个公民因战争流过一滴血。”也没有哪一位总统在退休后比卡特更风光。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2002年10月11日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已是78岁高龄的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以表彰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

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普兰斯一个花生农场主家庭里，1946年毕业于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即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在海军部队服役7年。卡特1953年因父亲去世，退役回家乡经营卡特农场、卡特仓库等业务，并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62年他步入政坛，1970年至1974年任佐治亚州州长，以积极消除种族歧视及办事富有实效而赢得声誉。1977年，他作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登上美国的权力之巅。1980年竞选总统连任失败，于1981年1月回到他的家乡重新经营农场。

卡特执政期间美国外交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特别是在调解国际争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巴拿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促使以色列与埃及达成了戴维营协议，拯救了美国在伊朗的人质。

美国从1977年开始，对石油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同时能源危机不断爆发。美国石油主要来源于中东地区，当时埃以矛盾加深，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同时可能导致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因此，卡特下决心要扭转这种不利于美国的局面。但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土地归属、以色

列的安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等三大问题。卡特权衡利弊，还是下决心试一试，他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外交才干，运用自己的外交谋略，争取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卡特在担任总统职务之前就访问过以色列，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伦理上有共同性，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家园是符合圣经教义的，因此他重视以色列的安全，这是与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一致的。卡特总统在中东进行了穿梭外交，促进解决了埃以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直至1979年3月26日，埃以双方终于在白宫正式签署和平条约，结束了双方长达30年的敌对和战争状态。

前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是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建立起来的，美国为其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一直支持这个残暴的专制政府。1977年，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主义领袖霍梅尼的号召下，伊朗爆发了针对美国的反国王暴政怒潮。1978年，伊朗全国发生了要求废黜国王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巴列维尽管有美国的支持，还是抵挡不住全国要他下台的浪潮，只好接受了要他离开伊朗的要求。美国以同意治病为由接纳了巴列维。这引起了霍梅尼政府的不满，于1979年11月4日逮捕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大使及官员共52人。此后的400多个日日夜夜，卡特为营救这些人质而绞尽脑汁。他请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人充当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中间人，并以资产谈判作为人质的筹码，直至1981年1月20日，新总统就职，他离开白宫那一天，人质终于被释放。虽然人质事件是直接影响卡特连任的重要因素，但人质的安全返美不能不说是卡特施展外交谋略锲而不舍地进行多方外交努力的结果。

卡特在退休之后常常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去调解那些棘手的国际纠纷与冲突。其中，他成功地调解海地危机最能体现卡特坚忍不拔的外交才华和谋略。海地是加勒比海中一个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国，1992年建立了以塞德拉斯将军和毕安比将军为首的军政权。美国不愿看到自己的后院有这个军事政权，自它建立以来，美国用尽了包括外交说服、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等种种手段来取缔它，但毫无结果。1994年，美国为了维护其超级大

国的脸面，决定用武力拔掉这个钉子。9月15日，克林顿宣布，如果海地军人首领不主动交权和离开海地，美国将用武力强制他们下台。克林顿在他的上述讲话一结束，就立即任命前总统卡特作为特使前往太子港斡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同海地间的冲突。克林顿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认为卡特有很高的威望，在调解复杂的国际冲突方面经验丰富，善于使用谋略手段；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卡特调解失败，他出兵海地就名正言顺了，对国内也好交待。克林顿给卡特提出的任务是：在9月18日中午12时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只要海地军人政权首领同意下台，也可以不要求他们离开海地。到9月18日下午7点30分，终于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议会最迟于10月15日前通过大赦令，塞、毕等3人提前退休，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7点45分，该协议传回白宫。8点正，克林顿下令撤销入侵计划，正在飞往海地的飞机返回美国基地。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在卡特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通过和平谈判得以化解。可以说，如果卡特在危急关头稍有动摇，结果就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一事件使卡特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触及美国资本家在古巴的利益以来，美国就开始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并采取暗杀等多种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以逼古巴就范。但小小的古巴在卡斯特的领导下毫不屈服，美古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卡特当总统后，立即将实现美古关系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1977年3月，卡特放松了对古巴的制裁，放宽了美国公民到古巴的限制，并安排了美古之间断交长达16年来的首次官方接触。卡特的做法得到了卡斯特的积极回应，古巴释放了在猪湾事件中被俘的数千名美国人。为改善两国关系，两国领导人的特使穿梭于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正当两位国家元首积极推进两国关系之时，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抛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反卡斯特罗势力的口实，迫使卡特政府不得不中断了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谈判。2002年5月12日，卡特访问古巴的梦得以实现。卡特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访问古巴的第一人。

卡特表示，他一直期待着与卡斯特罗主席的会面，并相互“探讨和平、人权、民主和如何减少人类的不幸”。尽管布什政府对古巴仍持敌对态度，但卡特的这次访问为改善两国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卡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提倡博爱、和平与人权，并在国际关系中也提倡“正义、宽容、同情和爱”。他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如此。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清剿塔利班的战争刚一结束，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再次出兵伊拉克。卡特不赞成布什当局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是错误的，并表示如果他仍是国会议员，他将对布什政府的动议投反对票。他指出，必须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协调努力，迫使伊拉克接受无条件的核查，而不是单方面由美国完成。

现在，卡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他对调解国际冲突仍然乐此不疲，他同夫人罗莎琳都表示：“我们要为人类避免争端和战争而不懈努力。”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25 年生于英国林肯郡，原名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小玛格丽特聪明好学，在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文体方面也不甘人后，参加了学校的曲棍球队，还得过诗歌朗诵奖。1943 年，她考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化学系。玛格丽特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加入了大学的保守党协会，结识了不少保守党的知名人士。1946 年她当选为该校保守党协会主席，为日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大学毕业后，玛格丽特来到伦敦，在工厂谋得化学师的工作。然而这份工作不能满足她的宏伟志向，她开始自修法律，并积极参加当地保守党支部的活动。

1949 ~ 1950 年，她两度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均告失败。此后，她顺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进入法律界，当上了税务律师。她勤奋工作，解决不少复杂的经济纠纷，培养了删繁就简、直截了当的作风。这种作风伴随了她以后的整个政治生涯。在此期间，她邂逅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丹尼斯·撒切尔，两人 1951 年结秦晋之好，两年后，生下一对孪生儿女。

孩子稍大，撒切尔夫人又开始为竞选奔忙。1959 年，在芬奇莱选区竞选成功，进入下院，很快成为全国最知名的女人之一。

1961 年，麦克米伦首相破格提拔她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64 年保守党下台后，她先后担任保守党影子内阁的住房和土地、财政和经济、动力和燃料以及教育事务的发言人。1970 年保守党上台，她出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4 年保守党政府安排了两次大选，结果都是撒切尔夫人异军突起，果断地参加了竞选，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魁。荣登领袖宝座之后，她就向首相而奋斗，经过一番努力后，在 1979 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大获全胜，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后又在

1983 和 1987 年的大选中连选连任。

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关头，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英国病”。她果断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紧缩货币供应量，减少公共开支，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削减个人所得税，出卖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刺激生产。她还压制了 364 位经济学家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攻击，两次改组内阁，以求得指挥部的步调一致。时值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爆发，给了她再次获胜的契机。

她立即成立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决定派遣特混舰队，以武力收复马岛。美国及联合国等出面调停，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内阁中也有人主张以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然而首相坚决主战，她动员全国人民说：“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其意义远远超出保卫马岛及岛上 1000 多名英国人的生命。这是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挑战。战争必须结束，也会尽快结束。”英国大规模增派部队，于 6 月 4 日攻占马岛首府斯坦利港，阿根廷部队被迫投降，英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马岛战争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国人几乎忘记了国内的经济危机，欢天喜地庆祝胜利，自信心大大增强。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日渐衰弱的国家。我们有了信心，我们有能力解决经济困难。这种信心在 8000 英里以外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并被证明是无坚不摧的。”

保守党的统治稳固了，撒切尔夫人的信心更强了。她大刀阔斧地推行其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陆续将国营的煤、电、水及通讯等公用事业的公司卖给个人，并出售了地方政府修建的住房。在她强有力的干预下，英国经济复苏了。1982—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3%，通货膨胀率不足 5%，生产力平均每年增加 45%。长期蔓延的“英国病”得到根治，撒切尔夫人也赢得了“西方经济复苏的先驱者”的桂冠。

在对外关系上，撒切尔夫人也充分显示出她泼辣果断、锋芒毕露的风格。她对欧洲联合的态度的转变具有戏剧性。上台之前，她并不反对欧洲联合，但反对英国向欧共体支付巨额的会员

费。1979 年入主白厅后，她在谈判中一反外交家平稳圆滑、模棱两可的策略，而是直截了当，咄咄逼人，锱铢必较。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使英国的会员费降低了约 66%。但是，从此以后，她与欧共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协调，甚至导致内阁分裂，这成为她在 1990 年辞职的原因之一。

19 世纪和 20 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两个重要的世纪，前者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强世纪：后者是一个日趋衰弱，惨淡经营的世纪。这两个世纪都和两个伟大的女性有关系。维多利亚女王成为盛世明君，功不可没，撒切尔夫人力挽狂澜，重振英国雄风，不愧政坛“铁娘子”。

金大中

金大中是韩国现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总统。他博学、宽容，自幼胸怀远大抱负：要成为韩国总统，并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自从金大中 20 世纪 60 年代投身政坛以后，他更加时时想起自己少时的两个伟大的抱负：在竞选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的选举中获胜；实现国家的统一，或者为此奠定基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金大中就提出分三阶段统一南北的构想。金大自在 3 次竞选总统的努力失败以后，终于在 1997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梦想。在他担任总统后，他要致力于实现他的第二个伟大抱负。金大中的“三阶段”构想首先要求朝韩组成一个邦联，在这个邦联中，它们将维持一个民族的原则，有两个拥有独立政府的国家，并使双边合作制度化。在第二个阶段，朝韩将组成联邦，在这个联邦中，将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种制度，但是有两个自治的地区政府。在这种联邦的制度中，对外关系、外交活动、国防等其他重要的外部事务将由一个中央政府来管理，而两个自治的地方政府将管理余下的内部事务。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将完成统一事业——建立一个既有一个中央政府又有几个自治的地区政府的统一的国家，就像美国或德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基于金大中对处理朝鲜内部事务的经验和了解，他坚决相信，促进双边合作与交流是消除朝鲜半岛处于冷战中的紧张局势的惟一途径，并且将为实现国家统一奠定基础。

金大中认为，为了统一，南北首先应结束几十年来的对立状态，这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尤为为重要，韩朝大力改善关系符合形势的需要，也符合朝韩人民的利益。南北人民同属一个民族，相互交流有深厚基础。金大中感到，要消除南北对

立，促进两国交往，首先要使领导人相互来往，相互沟通。

2000年6月13日，在朝鲜民族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朝鲜半岛北南人民迎来了分裂50多年来的首次北南首脑会面。金大中对金正日和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无限感慨”，并“体会到北方的诚意”。金大中与金正日在百花园会晤时，双方谈笑风生。金正日说，这次首脑会晤“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今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金大中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个历史。”金大中抵达平壤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使坐在电视机旁收看的韩国观众热泪盈眶，鼓掌欢呼。14日，金大中和金正日在举行单独会谈后签署了《共同宣言》，宣言再次确认民族自主统一原则，并就交换离散家属故乡访问团以及扩大经济合作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是继1991年《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后双方签署的又一重要文件。一项调查还表明，金正日的受欢迎率已从首脑会谈前的15.1%上升到50.2%。

金大中制定了对朝政策：“阳光政策”。“阳光政策”包含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南、北之间“和解与合作”所需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遏制战争；二是战略上的包容；三是对南、北关系的和平管理。“阳光政策”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战略；加速改革开放步伐和与韩国和解、合作符合朝鲜自身利益的战略，也是将韩朝从过去对立结构转换成合作的结构，将过去的敌对关系发展成相互尊重与合作关系的战略。金大中上任后，除致力于恢复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韩国经济取得显著成果外，积极推行“阳光政策”更使其总统生涯大放光彩。

……虽然朝鲜方面有些人并不喜欢“阳光政策”这一称呼，为此，2000年12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在挪威奥斯陆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韩国总统金大中，以表彰他也为改善韩国和亚洲的民主与人权，促进同朝鲜的和平所作出的努力。金大可是自诺贝尔奖设奖100年以来第一位获奖的韩国人，也是韩国自有总统以来第一个获奖的在任总统。金大中十分关心朝鲜核问题，他说，朝鲜核问题虽然还存在许多变数，但是这一

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必须通过和平的、外交的和对话的方法解决。他说，韩国坚决反对朝鲜开发核武器，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在协商解决核问题时，必须包括朝鲜一定要遵守达成的协议，并保证进行彻底验证的内容。他还特别强调了朝美对话的必要性。他说，只要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就应该对话。尽管双方的关系不好，也应对话，关系好坏与对话协商是两回事。

2003年2月24日，77岁高龄的金大中，告别青瓦台，五年总统生涯也从此画上句号。金大中严肃表示：“为国民服务是我人生最大的自豪。五年来，国民与政府奋发拼搏，为国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此时卸任隐退，感到无比欣慰。”金大中卸任以后，韩国政界要求他担任“对朝特使”的呼声不断高涨。一位韩国政界核心人物说，金大中是一位经验丰富且知识渊博的老政治家，为谋取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和朝美关系的改善，目前韩国政府正在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韩国媒体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给金大中两个任务：一、为改善韩朝关系，派遣金大中以特使的身份访问朝鲜。二、为促进六方会谈，委派金大中为“巡回全权大使”，到美、中、日、俄4国进行斡旋。

乔治·布什

乔治·布什是美国布什家族出任总统的第二人，被称为“小布什”，以区别他的父亲。小布什上台后，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要以进取的姿态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服从美国。为此，他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并用暴力来压制对美国干涉的反抗。人们不难看出，小布什对单边主义有强烈嗜好。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其实就是全球霸权主义。为推行和维护其霸权主义，小布什采取了比美国历届总统更加大胆、更加狂妄的手法。

他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严肃性，以美国的利益为标准对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准则及各种国际条约、协议、协定进行随意解释，对美国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则不执行，但却要求别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声称，联合国等组织的作用就是帮助进行武器检查、维持和平和开展人道主义活动，但它们不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他“永远不会把美国的军队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也就是说，在小布什眼中，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只不过是年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美国必须绝对服从，而不能向美国“挑战”。

小布什声称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构成对世界秩序的严重挑战，他将伊拉克、伊朗、朝鲜三个敢于叫板美国的国家列为“邪恶轴心”国，明确将这些国家划定为敌人，为其武力压制这些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将建立国土安全作为其政府工作的核心。2002年11月25日，小布什签署了关于成立国土安全部的国土安全法。小布什此举是美国联邦政府自1947年以来最大的调整，从而大大增加了他本人所拥有的权力。

小布什热衷于搞单边主义是因为美国有无人可比拟的实力。但欧洲盟国不买小布什的账。

二战后，美国与西欧主要国家结成了亲密的盟友。美国也十分注意与这些盟国协调立场。小布什也曾强调美国必须加强同欧洲国家的磋商，与欧洲国家“建立起强大的伙伴关系”，指导北约成为一个“强大、团结和积极的组织”。由于小布什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过分强调美国的利益，处处要求欧洲盟国服从于美国的利益。但小布什单边主义的日益膨胀及竭力使反恐战争扩大化，特别是其“先发制人”战略引起了欧洲盟国的疑虑和不安。欧洲人认为“先发制人”战略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是不合法的，美国开始采取“倒萨”行动之后，美欧分歧进一步加深。德国和法国与俄罗斯结成“反战阵营”，公开对美国“倒萨”说“不”。法、德等国作梗，使北约在对伊开战问题上难以做出统一的决定。小布什对此非常恼火，就以对美国“倒萨”的态度将欧洲盟国划分为“老欧洲”和“新欧洲”。

美欧关系虽然目前有些裂痕，但不会破裂。今后，小布什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还必须借重欧洲国家，尤其是“老欧洲”的力量。正如小布什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所说，现在的世界局势就像是二战刚结束时那样。美国及其盟国要像战后初期那样，充分把握这一机遇，采取决定性行动，谋划新的国际秩序。为建立新秩序，必须重视大国作用。

小布什十分重视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他上台伊始就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在俄的核设施安全和核武器销毁，以及在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合作。发展美俄关系是美俄双方的需要。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的魅力在于，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小布什想确保能源安全和美国在经济上不依赖欧佩克和阿拉伯国家，只有俄罗斯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能帮美国这个忙；另外美国要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俄罗斯是关键。“9·11”事件之后，普京抓住小布什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由于美国与欧洲盟国对威胁和安全问题上的理念不同，分歧加深的机会，全力支持美国反恐，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使两国关系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小布什在发展美俄关系的同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小布什在竞选活动中声称“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竞争对手”，提出美国必须在“没有幻想的情况下同中国交往”。这与其前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大相径庭，也与其父老布什的对华政策相左。

也许小布什意识到，中国毕竟是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其上任不久就让其父以“老朋友”的身份访问中国。2002年2月，小布什以总统身份首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得到了迅速恢复。

2002年10月22至25日，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了美国，这是中美两国首脑在一年内的第三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台湾、人权、宗教以及伊拉克、朝鲜核武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小布什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表示赞赏中方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政府的上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9.11事件迫使小布什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两国元首会晤就重大问题进行了沟通，增进了相互了解，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对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起到了其他国家难以起到的积极作用，使小布什及其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价美中关系。

小布什刚上台时，在外交方面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但小布什政府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外交强势政府。小布什执政几年来，在推崇强权外交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在外交手法和谋略上别出心裁。他善于重用前朝干将弥补自己外交经验不足。美国舆论认为，由科林·鲍威尔、迪克·切尼和康多莉扎·赖斯组成的三驾马车把握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由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是军事力量，构成了美国强权外交的基础。小布什负责外交政策的高官和主要顾问都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又多在以前的里根、老布什政府有过从政经验。

待客的最高礼遇是到私人牧场。小布什入主白宫以来，在推行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十分注意有选择地与各国领导人建立

私交。其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邀请访美的国家领导人到他的克劳福德牧场去做客。他请这些国家领导人参观他的牧场，品尝他的家乡烤肉，为的是增加一些友好的气氛，有利于双方深入交谈。有不少媒体在描述这一现象时，把其称为布什特色的“个人外交”，即通过与面对面交流的外国领导人形成良好的个人关系，来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提升和发展。

从实际效果上看，小布什执政以来，他的“个人外交”虽不能说十全十美，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除了与中、俄领导人努力建立个人间的亲密关系外，欧洲各国一直就是小布什“个人外交”努力的重点。不少外交政策专家对小布什过分依赖首脑间“个人外交”的做法提出了警告，他们认为，小布什建立的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友谊”并不能代替现实的国际战略。

事实也是如此，小布什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套近乎、拉关系的策略，获得的并不是世界其他各国民众的普遍好感，也招来一片质疑和反对之声。作为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外的所到之处往往都会遇到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与小布什打过交道的不少外国领导人也认为，尽管布小什常常热情洋溢地把个人友谊形容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对小布什来说，这种“个人间的纽带”根本没有国内政治目标来得牢固和重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总统形象与外交问题的历史学家佛瑞德·格林菲尔德认为，小布什的“个人外交”不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甚至还激起了外界对美国和美国领导人更大的反感。他说：“到目前为止，小布什一直在试图塑造这样一种形象，即他坦率正直、信守承诺、说到做到；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常常信口开河、屡屡不守承诺，行为和举止充满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色彩。”

菲德尔·卡斯特罗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 1926 年 8 月 13 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1959 年 1 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 1962 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1965 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至今。自 1976 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数十年来，卡斯特罗为人们所佩服的是，他使用良好的外交谋略，带领一个 1000 多万人口的小国与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巧妙周旋，他始终坚强不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古巴民众称他为“菲德尔”或“总司令”。在国际舞台上，卡斯特罗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古巴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它们提供医疗、体育、技术等援助。卡斯特罗在发展中国家中受到广泛尊敬。在许多国际和地区会议上，只要卡斯特罗一出现在会场，马上就会响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许多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

在当今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新时代，卡斯特罗奉行多元化外交政策。他十分注重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关系。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与古巴断交的拉美国家先后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或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古巴同时积极改善同西欧及其他各国的关系。

在古巴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同美国的关系了。为了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卡斯特罗与美国前后 10 位总统进行过较量，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卡斯特罗和他领导的古巴却往往是胜利者。对古巴来说，一方面“坚持与美国抗争，维护民族独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经济发展机会”，这两方面都符合古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以卡斯特罗选择在坚持立场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灵活的策略，只要美国方面表示出合作的姿态或松动古美关系的意向，古巴就会予以积极回应。卡斯特罗还派遣古巴棒球队多次访美，通过比赛增加两国民间的往来，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棒球外交”。

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卡斯特的既定政策。古巴原是苏联的盟友。所以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具有许多优越条件。2000 年 12 月 13 日深夜，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普京紧紧握住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手。普京是冷战结束后第一位访问古巴的俄罗斯国家元首，一度冷淡的俄古关系因此骤然升温，从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俄罗斯和古巴曾是密切盟友。40 年前，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古巴需要前苏联这个大国的支持与援助。为了抗衡美国，前苏联也需要古巴这个反美“战略前哨”作依托。当时，古巴把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确定为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前苏联向古巴提供从粮食到能源的几乎所有必需品。但是，随着 1991 年前苏联解体，俄罗斯断绝了对古巴的一切援助，前苏联解体使古巴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0 亿美元，古巴经济遭受重创。普京到访的第二天，在哈瓦那革命宫与卡斯特罗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及涉及经贸、外交、卫生、司法等方面的 5 个合作协定。卡斯特罗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他与普京“在几乎所有国际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普京则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对古巴实行的长达 40 年的经济封锁和所有与封锁有关的治外法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古巴人感到由衷佩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前苏联解体和美国加强对

古巴的封锁，古巴经济陷入危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古巴政府和人民感谢中国的援助，卡斯特罗多次在党内说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在困难时期给予我们的帮助”。古巴对于中国国庆 50 周年十分重视，为此，卡斯特罗示其外交部专门成立了工作班子，1999 年 9 月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卡斯特罗高度赞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他曾多次到中国驻古巴使馆作客，这在别国驻古巴使馆恐怕是很难看到的。1999 年我国在天安门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卡斯特罗亲临使馆观看实况转播。威武雄壮的各军种方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只有纪律严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练出如此整齐划一、富有气势的分列式。

卡斯特罗邀请罗马教皇访古，是他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1998 年 1 月 21 日至 25 日，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应邀访问了古巴，教皇的到访为卡斯特罗大增光彩。卡斯特罗邀请教皇访古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教皇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改善古巴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而教皇不顾年迈出访古巴的目的则是利用古巴放松对古巴天主教会和教徒的限制的有利时机，扩大天主教会在古巴的影响，同时也乘机宣扬人权，要求古巴有更多的自由和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此前曾 14 次访问拉美，他足迹遍及拉美各国，但却从未访问过古巴。因此，卡斯特罗邀请教皇访问古巴非同寻常，意义深远，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世界各国 166 家电视台和 3000 多名外国记者云集古巴进行采访，大批外国游客和千余名美籍古侨也乘机返回故里。卡斯特罗亲自对接教皇来访作了精心安排。并几乎全程陪同教皇参加了在哈瓦那、圣克拉拉、卡马圭和圣地亚哥的主要活动。最使卡斯特罗本人和古巴人民感到欣慰的是，教皇在访古期间，严厉地谴责了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的封锁是“不公正的，从道义上说，是不能接受的”。教皇敦促美国政府取消这种不公正的制裁，主张在华盛顿和哈瓦

那之间建立外交对话。古巴为教皇的来访作了充分的思想、物质准备，并以出色的组织工作、有礼貌的接待，通过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在全世界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古巴国内形势稳定，人民具有良好教养，经济虽有困难，但改革开放正在深化，国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形象。教皇访问古巴的本身及他对美国的批评，对古巴来说无疑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对美国来说则是分量不轻的压力。在教皇结束访古后不久，1998年2月，古巴政府宣布释放299名普通犯人和政治犯，这是自1988年古巴政府宣布释放44名政治犯以来，释放犯人人数最多的一次。古巴政府这一举措受到梵蒂冈、欧盟和西半球各国舆论界的欢迎和好评。

奥洛夫·帕尔梅

政治家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奥洛夫·帕尔梅就是其中的典范。

奥洛夫·帕尔梅，1927年1月30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名门望族之家。

1954年，27岁的帕尔梅出任社会民主党主席、首相埃兰德的秘书和首相办公厅首席秘书。这是帕尔梅政治生涯的重要一步。1958年，帕尔梅作为延彻平省议员进入瑞典议会上院，时年30岁，为当时瑞典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1967年，帕尔梅又被委任为教育和文化大臣，领导了瑞典的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

1969年10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42岁的帕尔梅以全票当选为党的主席，接替年迈的埃兰德，成为当时欧洲最年轻的首相。这样，帕尔梅登上了他仕途的顶峰。

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民主党各任首相始终不渝的基本方针。帕尔梅首相在继续维护“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同时，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使之不断深化和完善。

瑞典的福利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到帕尔梅执政时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瑞典，实现了免费教育和近于免费的医疗保障；人均居住面积已达40多平方米，名列世界前茅；雇员患病时能得到正常工资90%的病假工资；提供给退休雇员的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可达在职时的2/3左右；小孩出生后，国家给每个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统一的免税补助，父母双方可以度过共12个月的假期，等等。这种福利模式，成为当今世界的“橱窗”和“样板”。

帕尔梅上任后继续执行其政治恩师埃兰德的社会经济和福利

政策，以及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当然，帕尔梅并不是一位以守摊来维持政权的社会党领袖，作为埃兰德的得意门生，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治国才能。尤其是在维护国内和世界和平方面，在西方世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

这位新首相首先把他的和平信念变为实践。在 60 年代就任总理期间，他谴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并给逃避征兵的美国人提供政治避难，引起了瑞美关系长期冷淡。另一方面，帕尔梅强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甚至把后来的捷克领导人描绘成“独裁制度的仆从”。并把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政府叫做“该死的刽子手”。

在帕尔梅看来，只要是采取武力解决争端，只要是采用独裁专制统治国家的手法，都是非民主、非人道的政策，不管他是属于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所为，他都大加抨击。不留情面。帕尔梅把更多的感情留给了急需支援和帮助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70 年代初，他的政府大大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都一再敦促富国更多地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要求。

在以后的三次全国议会大选中，帕尔梅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均接连获胜，继续组阁。70 年代中后期，西方世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处在北欧的瑞典也受其影响。帕尔梅指望通过大举外债的办法来减少世界经济衰退对瑞典经济的影响。以维护“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可是这种寅吃卯粮的办法造成了高额的财政赤字，反倒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低谷而不能自拔。再加上他赞成在瑞典建造核电站的态度给反对党以攻击的口实，导致了他的党及他本人的下台。

人们都说，无官一身轻。可对于帕尔梅来讲，是一个例外。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期间，帕尔梅都忙碌于国际和平事业的活动。作为社会党国际的副主席，他领导着该组织的南非问题研究小组，于 1977 年夏天到该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同年，他成为“独立的国际发展问题委员会”成员，曾对非洲作实地考察。其出色的表现，使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荣获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大学颁发的杰克逊和平奖。1980年，帕尔梅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数次出访伊拉克和伊朗，从中斡旋调停。世界上各大报纸头版对此突出报道。这位瑞典前首相还是“勃兰特世界发展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建立了非政府组织“裁军和安全问题委员会”，有人甚至称之为“帕尔梅委员会”，他出任该委员会主席，为世界的和平与裁军而奔忙，1982年6月，“帕尔梅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长达200页的《共同安全》报告，陈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状况，主张建立一个无战场核武器地区，反对以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各国关注人类的和平事业。

1982年瑞典进行大选。广大选民对当局实行的勒紧裤带政策不满，而选择了主张充分就业和增加公共开支的社会民主党。帕尔梅在阔别了他六年之久的首相府后，又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上。

面对8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的僵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频繁争夺，再次出任首相的帕尔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维护本国的和平与安全之上。他在上任后宣称：社会民主党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奉行武装中立政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卫瑞典的领土不受侵犯。”

自1981年苏联一艘潜艇在瑞典的海军军事基地卡尔斯克鲁纳附近搁浅后，不明国籍的外国潜艇频频进入瑞典海域。1982年为47次，1983年达63次之多。帕尔梅政府对此采取了自卫行动，宣布瑞典海军无须事先警告即可向侵入领海的外国潜艇发射火器。1983年4月，帕尔梅召见苏联驻瑞大使，向他递交了一份照会，强烈抗议苏联潜艇1982年10月初侵犯瑞典的霍尔姆斯海湾水域。潜艇事件又一次触发了这个中立国家人民的敏感神经，瑞典自发的国防运动与和平运动变得活跃起来。作为首相的帕尔梅表现出主权高于一切的勇气，甚至命令海军直升机向不明国籍的潜艇投深水炸弹。

作为世界和平事业的积极卫士，帕尔梅多次向各国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呼吁超级大国进行谈判，停止军备竞赛

和裁减核武器。同时，他的党也在为继续争取建立中欧无核区走廊和北欧无核区而努力。

帕尔梅对地球上任何一个热点地区的冲突都非常关心，他心中经常牵挂着世界大小角落的和平与安全。但他却恰恰忽视了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公事之后的安全保卫。他从反对特殊，便于接触群众方面考虑，拒绝在工作之外对他的警卫保护。可是，他很少甚至没有想到他本人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的攻击目标。

1986年2月28日，一颗罪恶的子弹打破了瑞典那令人悲痛的宁静。

1984年6月，中国总理访问瑞典。他在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上讲：“中国总理来访，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认为这次来访是两国间历来存在的良好诚挚关系的明证。他称赞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瑞典文化的影响。首相还愉快地接受了访华邀请。遗憾的是，帕尔梅还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就猝然离开了人世。

帕尔梅去世几年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约集团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平与裁军进入一个新阶段。但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不断。战火依然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燃烧，同帕尔梅为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不会被世人忘却一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任何时候也不应停止。

胡斯尼·穆巴拉克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外交理念和原则是“以和为贵”，他极力主张与邻国搞好关系，主张用和谈的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他是第三世界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

穆巴拉克为了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利益，能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很讲策略地处理各种双边和多边问题。1981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时任副总统的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表现令埃及人十分不解，他先是对萨达特的身亡幸灾乐祸，接着又号召埃及人民乘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推翻萨达特的继承人穆巴拉克。卡扎菲的这种举动，对于一个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可以说是难以忍受的。然而，穆巴拉克丝毫没有计较卡扎菲的那些不恰当的言论。为了本国周边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也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他决心化解与卡扎菲的矛盾，并大幅度调整对外战略，执行与前总统萨达特明显不同的战略，既不像萨达特那样惟美国是从，也不像萨达特别那样处处与利比亚作对，而是站在阿拉伯国家的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寻找与卡扎菲的共同点，逐渐赢得了卡扎菲的好感，甚至信任。1986年，美国和利比亚关系再度紧张，后来，利比亚果真多次遭到美国的袭击，利美矛盾不断升级。而穆巴拉克坚定地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上，反对美国对利比亚的袭击。穆巴拉克还利用埃及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做了许多调解工作，并真诚地安抚卡扎菲。日久见人心，利比亚终于恢复并增强了对埃及的信任，恢复和发展了与埃及的友好关系，卡扎菲终于向穆巴拉克伸出了友谊之手。利埃双方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穆巴拉克就任埃及总统后，充分利用埃及的国际地位和自己的威望，在地区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在中东地区、非洲

地区、伊斯兰世界、不结盟国家、欧洲及地中海国家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充分显示了他的外交才能和谋略；在国际事务中，他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主张在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南南合作。在国际上，他致力于加强同世界大国的关系，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并大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由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地区性组织活动。

穆巴拉克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总统十分关心中东局势。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国，与美国关系良好，而且，穆巴拉克本人又是一个有威望的总统。所以他在阿拉伯国家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他对中东的外交战略是：通过积极进取的外交活动，巩固埃及地区大国的地位，致力于促进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他一再强调，和平是中东地区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中东和平终将实现，穆巴拉克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早在 1999 年 6 月，他为此专赴美国向美通报阿拉伯国家对中东和谈的立场，说服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力促尽快全面恢复阿以和谈。在访美之前，穆巴拉克曾与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内的阿拉伯：有关方面就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他们积极呼吁美国全面启动巴以、叙以和黎以和谈并使和谈取得进展，以恢复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信任。但埃及坚持恢复中东和谈必须以联合国安理会 338 号和 242 号决议为基础。认为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是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础。2002 年 11 月 2 日，穆巴拉克在纪念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害 7 周年向以色列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和平是中东地区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因此，中东和平终将实现。实现和平是让本地区所有人过上安全、富裕和享有尊严的生活的捷径。他说：“拉宾相信，中东地区可以成为不同民族和宗教和平共处的典范，和平是解决阿以冲突和建立安全与稳定的中东新秩序的可靠途径。”穆巴拉克把拉宾称为“亲爱的朋友”和“一位无可比拟的、罕见的政治家”。

穆巴拉克认为，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公害。因

此，反恐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务，而必须就情报调查和引渡罪犯等问题进行紧密的国际合作，穆巴拉克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合作。早在 1986 年，埃及就倡议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反恐国际会议，就有关问题订立共同遵守的章程。他认为，美国不能指望通过一场阿富汗战争解决问题，反恐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长期任务。穆巴拉克强调，要消灭恐怖主义，就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是恐怖主义活动产生的原因之一。2001 年 9 月 11 日是美国人的一个极其阴暗的日子。这一天，美国的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遭恐怖分子的前所未有的严重袭击。美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美国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

然而，穆巴拉克反对避开联合国，借反恐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2003 年年初，在美英等国在海湾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对伊开战之际，穆巴拉克认为，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发动战争不符合埃及利益，不利于地区和世界的缓和与稳定。所以他多次向美国提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建议，对美晓以利害。

穆巴拉克对中埃友谊与合作关系十分重视。他强调说，埃及是中国人民全天候的朋友，中国人民是埃及人民的真正朋友，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埃中两国的关系很好，我们要把这种友谊长久地发展下去。埃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进行着很好的合作。他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埃方愿意学习、借鉴中方的成功经验。强调埃及与中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他认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非常美好。他说，埃中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经常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联系和磋商。穆巴拉克高度评价埃中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合作。他说，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对埃中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感到满意。在新世纪应扩大埃中友好合作的范围和规模，双方在经贸、旅游、科技等领域的互利互惠合作有着广阔前景。与此同时，两国将一如既往地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汉斯·布利克斯

汉斯·布利克斯 1928 年 6 月 28 日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父亲是一位语言学教授，邻居们介绍说，布利克斯家的墙是粉红色的，挂着绿色的百叶窗，家里有一台钢琴和祖传的油画。年轻的布利克斯学习过英语、法语和德语，并于 18 岁那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

后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1956 年至 1958 年任世界自由与激进青年联合会主席，1959 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布利克斯进入瑞典外交部工作，在那里，布利克斯遇到了科蒂斯，平淡而又甜蜜地相恋、结婚并生下两个孩子。直到退休为止，科蒂斯一直在瑞典政府工作，负责北极和南极事务。

作为一名联合国老兵，布利克斯亲身经历了南非政府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自愿解除核计划的全过程，对核查制度了如指掌，他知道真正的解除武装意味着什么。

1981 年，布利克斯在卸下瑞典外交部长职务后不久被任命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布利克斯和该机构的核查队伍一直在伊拉克开展工作。

1991 年至 1998 年，布利克斯率领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小组和特委会专家们一起参加了对伊的武器核查工作。美国对他颇有微词，但总体上看，那时的美国官员认为，布利克斯工作十分勤奋，加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核计划的监督工作。

最近美国国防部责成中央情报局写一份报告，分析布利克斯作为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为什么没有从以前的核查中找出伊拉克的违禁武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总结说，布利克斯是个一切以书为证的律师，照章办事，他以前在伊拉克的核查受制于他的联合国官员身份，没有突破。

1999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284号决议，决定成立监核会来取代前特委会履行对伊武器核查、监测的职能。随后，美英两国提名与布利克斯同为瑞典人的罗尔夫·埃克乌斯为监核会第一任主席。埃克乌斯曾于1991年至1997年间担任联合国特委会第一任主席，对伊态度较为强硬。但俄、法、中三国反对这一提名，认为这将使伊拉克对监核会采取更加抵制的态度。

2000年2月，正在南美洲度假的布利克斯突然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电话，邀请他担任这一职务。

联合国安理会在给伊拉克最后一个遵守联合国决议、避免战争的机会的同时，也授予了对伊武器核查小组更大的权力，而该小组的负责人——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也一夜之间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

2002年11月18日，联合国对伊武器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会）主席布利克斯飞抵巴格达，这是这位74岁的瑞典老人2000年3月就任监核会主席以来第一次登上伊拉克国土履行职责。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布利克斯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布利克斯将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说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将手中的枪对准了萨达姆的话，布利克斯可能就是这把枪的扳机。

11月16日，布利克斯在巴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敢保证现有武器核查人员中一定没有“间谍”，但如果他发现手下任何一位工作人员真是哪个国家的“卧底”的话，那么他和监核会将毫不犹豫地将其清理出去。分析人士说，在武器核查展开之前，布利克斯作此表态，无非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伊拉克的顾虑，使武器核查得到伊方的支持并顺利进行。

在武器核查小组内，以布利克斯为首的专家组负责搜寻化学、生物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而巴拉迪率领的另一支专家组则负责搜寻核武器。因此二人向安理会提交的对伊武器核查报告可能决定战争是否爆发，因此他们二人肩上挑着一副“可怕的重担”。在谈到准备如何进行核查时，布利克斯说：“我们的原则是事先不打招呼。我们早晨走出驻地后才会告诉伊拉克方面，我们要去哪个方向；当我们接近目

标时，我们才会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要检查的地方。”他强调，任何走漏消息的核查小组成员都将受到严惩。

为了保证武器核查的公正客观，布利克斯对这个机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组织结构方面，他取消了副主席一职，代之以权力相对削弱的主席助理。原先特委会副主席一职历来由美国人担任，对该机构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该委员会在人员组成上主要以武器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由政客为主。在工作方式上，布利克斯对新的武器核查小组成员进行了“文化”培训，教育他们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帮助他们了解伊拉克的“民族敏感性”以及该国的传统习俗。

起初，美国提名的是前联合国监督伊拉克销毁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特别委员会主席罗尔夫·埃克乌斯，但遭到了法国、俄罗斯和伊拉克的反对，因为此人曾担任过瑞典驻美大使，被认为有亲美的嫌疑。为了妥协，法国提出，由来自瑞典的外交官汉斯·布利克斯担任这一职务，提议获得了安理会的批准。”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布利克斯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观点保守的人。

身为监核会主席的布利克斯尽管从来没有踏上过伊拉克的国土，但却在安理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布利克斯选拔的核查专家来自 40 多个国家，人数共近 300 人，其中美国的人数被控制在 1/10 以下，中国也有 6 名专家参加。监核会还组织了初级和高级培训班，对这些专家分领域进行培训，做好了核查准备。布利克斯领导的监核会还将前特委会留下的大量数据资料进行处理，最终锁定了至少 700 个核查地点。

布利克斯在任期间奔走各国，成为美、俄、法等国领袖的座上宾。仅在美国，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都分别与其促膝长谈过。《时代》杂志开玩笑说，布利克斯可能是惟一一位从飞机场直接坐出租车赶到白宫见总统的人。其用意当然是想让布利克斯在对伊核查中和向安理会的报告中能做出“有利”的判断，为美国对伊动武提供根据。分析家说，不论最终是否导致对伊的战争，布利克斯都将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

2003 年 12 月任新成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主席。

布利克斯著有《制定条约的权力》、《主权、侵略和中立》、《条约制定者手册》等。

布利克斯曾多次访问中国。

叶海亚·汗

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任巴基斯坦总统。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政策，中美之间长期处于对抗状态。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试图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途径。而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不厌其烦地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传话，为中美关系的突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9 年 8 月，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他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表示，美国不支持苏联在亚洲搞地区经济合作和集体安全组织。叶海亚说：“要保证亚洲地区的安全，就必须承认中国并与之对话。美国要改变对华态度，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尼克松说，他是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但由于美国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这个问题不能一夜之间得以解决，他正朝这个方向努力做工作。尼克松似乎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向叶海亚提出了求援的要求：美国表示，希望能同中国有一条非官方的来往渠道，希望巴基斯坦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叶海亚内心十分希望中美两国修好。因为，两个与巴基斯坦都友好的大国消除对立，无疑对巴有利而无弊。尼克松离开巴基斯坦后，叶海亚立即命令巴外交秘书（外交部长）尤素夫约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把他与尼克松会谈中关于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部分向张作了详细转述，同时一再表明巴无意为美国辩解，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友好的考虑。尤素夫认为，尼克松的这些表态，同美国前任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尼克松想改变对华政策、寻求同中国和解的重要迹象，希望中国朋友对这一动态加以密切关注。1969 年 11 月，叶海亚又单独约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

向他详述了8月尼克松访巴时与他的谈话。

叶海亚对张大使说，尼克松在拉合尔停留的24小时中，曾两次单独同他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请他从中做一些事。他先是拒绝，后答应传话。尼克松本来要求他直接转告周恩来总理，保持最高级联系。但他说周总理很忙，今年恐怕不一定能到巴基斯坦访问，于是建议通过中国驻巴大使转达。尼克松表示同意。

叶海亚继续说，10月15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直接给他来信称，尼克松渴望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叶海亚向中国转达一则消息：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以表示友好的诚意。

叶海亚表示，巴基斯坦十分珍视同友好邻邦中国的友谊，他要求张彤大使向中国政府报告两点：其一，他本人只是向中方转达美方的信息，别无他意；其二，请中国政府告诉他，他是否还要继续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叶海亚总统最后还强调说，这件事极为机密，既没有通过美国国务院，也没有通过巴基斯坦外交部。所以，中国政府如有什么答复，请张彤大使直接找他本人。

通过叶海亚传递的信息，中国领导人已经了解到，美国有接近中国的战略需要。但尼克松还没有接到叶海亚的转告，十分着急，于是便在12月初又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要他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从而打通与中国交往的渠道。

1970年10月下旬，叶海亚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尼克松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启动巴基斯坦秘密通道。

10月25日，叶海亚去拜访尼克松。尼克松正式对他说：“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你作为中介人对美国方面提供帮助。”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要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夙敌不容易成为新交。”叶海亚回国后，迅即将尼克松的话转达给了中国领导人。

在尼克松收到上述信件的前几天，1971年1月5日，尼克松通过叶海亚转达给周总理一个口信：“美国建议尽快在双方都方便的时刻、方便的地点，两国政府的代表一起讨论北京高级会谈的形式问题。”

在这之前不久，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美国友人斯诺，向他表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信息。

两天之后，叶海亚总统通过极为妥善的途径将周恩来的口信转给尼克松。3天后他收到尼克松的答复，其内容是：“我特别欣赏你在处理这些十分重要的口信来往时的微妙和机巧的做法，同时请转达我对周恩来总理的诚挚的谢意。”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交给了他尼克松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表示，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口信还提议由基辛格到中国同周总理或者一位适当的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口信建议通过叶海亚总统的斡旋，来讨论有关基辛格博士此行的细节。5月30日，我国外交部指示张彤大使，要他约见叶海亚总统，当面宣读周总理29日致尼克松的口信。当晚7时，张彤大使会见叶海亚，叶海亚逐字逐句作了记录后，并于31日通过希拉利把口信要点转达给了尼克松。在中、美、巴三方周到细致的安排下，基辛格于7月9日至11日秘密地访问了北京。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实现了他的访华梦想。坚冰已经打破，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每当中美两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的时候，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冷战年代为中美关系牵线搭桥而周密思考与耐心工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出谋划策巧妙周旋的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

亚西尔·阿拉法特

亚西尔·阿拉法特 1929 年 8 月 27 日出生于开罗。他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生了七个孩子，他排行第六。阿拉法特的祖父拉赫曼·古德瓦靠经商而发家，是当时加沙最富有的人之一。

1956 年 7 月，阿拉法特完成了大学学业。在他卸去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职务的同时，他又创立了巴勒斯坦毕业生联合会并担任主席。这样， he 可以和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甚至在欧洲的巴勒斯坦毕业生进行联系和接触。同时，他也在当时埃及最大的一家建筑公司谋得了一份土木工程师的工作。

1956 年 10 月，第二次阿以战争爆发。阿拉法特作为一名工程兵少尉亲身参加了保卫塞得港的战斗。他的未爆弹处理技术受到很高评价并因此而得到提升。

战争一结束，阿拉法特便回绝了埃及军队的挽留，和瓦齐尔一起开始了创建巴勒斯坦地下抵抗组织的工作。

1966 年 2 月，阿拉法特被阴谋卷入一起谋杀案，叙利亚官方以谋杀罪逮捕了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以及其他 20 名创建法塔赫军事组织的同事，决定密谋处死他们。

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事情真相之后，叙利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这些人。

阿拉法特出狱后离开了叙利亚，他带领一个法塔赫小分队潜入以色列北部进行侦察。就在他们完成任务返回的途中又被黎巴嫩巡逻队扣留并被投入了贝鲁特的监狱。在那里，阿拉法特经受了 3 个星期非人的折磨，直到黎巴嫩人发现这位化名为阿布·阿玛尔的俘虏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时，他才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不久以后，阿拉法特公开了他的真名，他被中央委员会任命为法塔赫的正式代言人。

1968年初，法塔赫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提出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民主国家的主张。在法塔赫所设想的巴勒斯坦民主国家中，犹太民族可以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与巴勒斯坦民族平等地和平地相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均作为官方语言。犹太人亦可以作为总统。这实际上是巴勒斯坦人走上和解道路的开端。

然而，法塔赫的这一主张还不能代表当时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意愿，这时的法塔赫还不是巴解组织的成员。在半年后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亦即巴勒斯坦人的流亡议会会议上，法塔赫的这一设想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它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让步。

约旦事件后，巴勒斯坦人陷入了失望与愤怒，这种情绪将他们引上了另一条道路——进行恐怖活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一件让世界关注他们的武器。当时，以“黑九月”、“人阵”、“民阵”为代表的巴解内部的恐怖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举世震惊的劫机、绑架、暗杀等事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那些被占领土上的年轻人的拥护。阿拉法特和许多巴解组织领导人都十分反感恐怖活动，他私下里利用一切机会劝说那些恐怖组织的头头们放弃这种愚蠢的作法，但是，他不能公开站出来反对，对于那些极度失望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如果这样做，阿拉法特将被整个抵抗运动所抛弃。最后，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参与到事态的进程中去，设法取得控制局势的主动，然后关上恐怖的龙头。

1969到1973年间，巴解组织因其一些派别的恐怖活动而在全世界遭到谩骂，阿拉法特本人无数次陷入以色列特务的暗杀阴谋中，黎巴嫩基督教派军队为了阻止巴解与穆斯林力量结盟而对其采取了军事行动。正值此时，1973年10月，中东十月战争爆发，从而使巴解组织从可能的毁灭中得救，并给了阿拉法特以政治手段继续进行斗争的机会。

十月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为了自己在这地区的利益不得不为解决阿以冲突作一些努力。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解姿态，他们在一项声明中暗示他们将接受失去故国70%土地的现实来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小型国

家。

随即，巴解组织取得了两项重大的政治胜利。一项是 1974 年 10 月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巴解组织被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另一项是 1974 年 11 月 13 日，阿拉法特戏剧性地出现在联合国讲台上。

阿拉法特在联合国的胜利给了巴勒斯坦人以巨大的鼓舞，但要说说服他们特别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接受“小型国家”方案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在前后长达 5 年的时间里，阿拉法特冒着被骂为叛徒的风险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300 名委员逐一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 1977 年 3 月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原则上通过了“小型国家”的方案。对阿拉法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随后，他被授权通过秘密渠道向以色列和美国传出了和解的讯息。

1982 年 6 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指挥了一场所谓对巴勒斯坦人“最后解决”的战争。在长达 86 天的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拉法特和西贝鲁特穆斯林区的居民们处在包围之中，他本人还时时处在以色列特务的监视之下并成为以色列轰炸机的首要目标。他曾一度真的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以“天国之风在吹拂”的口号发布了最后的战斗命令。然而，正是这种绝望反而激起了巴勒斯坦战士们同仇敌忾的勇气。战争以以色列军队无法消灭巴勒斯坦抵抗武装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解组织赢得了胜利，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撤出黎巴嫩。阿拉法特把他的总部迁到了突尼斯，而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则被分散到各远离前线的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中。这是自 1972 年被逐出约旦后，巴解组织所经受的又一次致命打击。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引发了一场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巴解组织因在海湾战争中公开支持过伊拉克而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指责，并因此恶化了它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开罪了阿拉伯温和国家，更激怒了富有的海湾国家，以致这些国家冻结了对它的捐助，使巴解组织财政吃紧，到了变卖资产，停发部分工作人员薪水的地步。严峻的处境迫使阿拉法特不得不为争取

各方的理解与支持而四处奔波。

海湾战争以后，美国为了取得在中东的特殊地位而着手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也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各自的立场。在各方努力下，1991年10月底召开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有阿以冲突各方参加的马德里中东和会。

1993年1月，在挪威外长霍尔斯特的调解下，以色列同巴解组织在奥斯陆先后举行了14次秘密会谈，终于在1993年8月达成协议，9月9日，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互致信件相互承认，9月13日，阿拉法特与拉宾飞抵华盛顿，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签署了巴以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1994年5月4日，这两位领导人在开罗正式签署了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执行协议。

1994年7月1日下午，当地时间3点15分，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在战友们的陪同下，通过以色列军队控制的埃及和加沙边界口岸拉法，进入加沙巴勒斯坦自治区，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巴勒斯坦家园。他亲吻着这块土地，激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半个世纪的苦苦奋斗，巴勒斯坦人民终于迎来了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尽管前面的路还很漫长，但是，阿拉法特和他的人民相信，只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斗争，他们一定能拥有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赫尔穆特·科尔

赫尔穆特·科尔，1930年4月3日出生在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

1959年，年仅29岁的科尔竞选州议员获得成功，成为莱茵兰—法尔茨州最年轻的议员。四年之后，科尔又当选为该州议会党团主席，深得当时的州长阿尔特迈尔的赏识和重用。

1976年，四年一度的联邦大选又到了。年轻的科尔向“全能政治家”施密特发起了挑战。由于自由民主党仍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联盟党才未能取得绝对多数而上台执政。

1976年大选的失利，对科尔也是一个不小的挫折，联盟党内，尤其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内对他的抱怨，攻击声一浪接一浪。科尔和施特劳斯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在1980年的联邦大选来临之前，施特劳斯强烈反对科尔继续作为总理候选人，要求由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党魁出阵，同社会民主党的施密特决战。这位自信的国防部长显然认为，如果他代替科尔领导联盟党进行竞选，施密特会失去他的总理职位。在一次被泄露给公众的私下谈话中，施特劳斯甚至断言：“科尔缺乏联邦总理的性格和头脑”。为了避免联盟党的分裂，共同对付真正的政敌——社会民主党，科尔表现出政治家能屈能伸的君子风度，断然作出让步，让这位自信的政治家施特劳斯去迎战施密特。

1982年10月1日，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二次“建设性不信任”表决在波恩进行。表决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以绝对多数票取得胜利，从而取代施密特立即成为第一位未经过全国大选出任的政府总理。同时，这位新总理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83年3月提前举行新的联邦大选，科尔以绝对优势击败威信日益下降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施政时期。面对接

踵而来的成功，科尔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上届政府留下的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和财政赤字巨大的烂摊子，并非能容易收拾。在联邦政府内部，他还要经常面临着来自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挑战。反对党更是在时刻寻找机会，以报一箭之仇。这些都成为对这位新总理的严峻考验。

到1987年联邦大选前夕，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失业率下降，外贸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科尔在众望所归之下，又一次蝉连联邦总理，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时期。

同他的几届前辈阿登纳、艾哈德、基辛格一样，科尔也是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强调北大西洋联盟和德美关系在西德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他修复了一度冷淡的德美关系，重建同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台后不久，科尔就飞往美国，弥合裂痕，修复两国协商渠道，建立了同里根的私人友谊。同克林顿的个人友谊也不错。从1994年7月起，德美之间建立了特殊伙伴关系。实际上科尔就任联邦总理不久，就坚决利用执政联盟的优势，使联邦议会通过了在西德如期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决议。1985年，当西欧北约成员国围绕着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倡议”进行激烈辩论时，科尔一开始就表示在原则上支持这个倡议。里根为了表示对科尔多次友好的回报，不顾国内许多人的反对，在1985年5月的西德之行中，去比特堡公墓，为埋葬在那里的所谓第三帝国的“阵亡者”致哀。

施密特和德斯坦合作的“蜜月”期，随着这两位领导人的相继离职而告终，接替他们掌权的分别是科尔和密特朗。这两位新人的合作虽不能说已达到了前任那样的亲密，倒也相处得不错。两位领导人相互尊重，注意协商，寻求谅解，共同维护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科尔上台的第三天，就飞往巴黎，声言要继续维护德法之间的特殊关系，有趣的是，1987年，科尔继续当选总理，翌年密特朗也蝉连总统一职。历史的机遇使他们有时间和信心去建立类似前任的那种“蜜月”关系。

也许都是由于保守党执政的缘故，科尔和撒切尔夫人建立了

较为信任的合作关系。外界早就传闻这位“铁娘子”态度僵硬，不好相处。这位灵活、善变的联邦德国新总理倒也愿碰碰运气，以图开辟新的合作天地。他在访问巴黎后，随即飞往伦敦，向首相撒切尔夫人发出了亲善的信号。

舆论称科尔是“亲美派”、美国的忠实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美国无条件的追随者。事实上，只要在一切许可的条件下，这位总理还是努力争取维护自己的利益，尽可能照顾西欧的利益。在1985年，美苏冰岛首脑会晤前，科尔亲赴美国，敦促里根总统与西欧磋商，提请美国注意西欧的利益。科尔的此举，是颇得人心的。

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是科尔政府对外活动的一大特点。这位新总理声称，他将恪守前政府与苏联东欧国家签订的所有条约，继续致力于真正的缓和、对话与合作。

考虑到西德自身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地位，这位总理虽没有象前任施密特在美苏之间推行力求两边讨好的走钢丝政策，而是善于克制，讲究策略，力图不恶化德苏关系，保持缓和成果。1983年7月，科尔总理出访苏联，谋求同苏联的进一步合作，这是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总书记邀请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

发展同民主德国的关系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天平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科尔比前面历任政府迈的步子都要大，他曾两次为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筹措资金，提供政府担保，给予了民主德国比前面各届政府所能给予的大得多的经济实惠。也正是在科尔的任期内，实现了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第一次访问，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了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是双方共同的需要和特殊的责任。

谋求主权的恢复，实现德国的统一，是从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等历届政府所奋力追求的外交目标；是解除雅尔塔体制的束缚，结束两个德国人为的分裂局面，实现德国统一的宏伟目标。荣幸地由科尔总理这一代领导人来完成了。

德国的统一，主要还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科尔的“十点计

划”在两德人们中间产生了强烈反响。两德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德国的统一。实现德国统一乃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中，得到西德朝野主要政党支持的民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等党上台执政，从而基本扫除了按照科尔的构想实现统一的内部障碍，加速了统一的步伐。

统一前景在望，但外部阻力仍在，科尔还需努力。后来，苏联看到德国统一已不可避免，转而支持德国的统一。这固然为科尔的统一行动开放了绿灯，但并非万事大吉，在未来德国的盟约归属和边界问题上，这位总理是遇到困难的。更别说科尔在德波边界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引起喧然大波。

科尔认识到，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障碍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和他的助手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在华盛顿、莫斯科、巴黎、伦敦等都留下了他们繁忙活动的踪迹。半年内，这位联邦总理两次出访苏联，开展政治和经济外交，给苏联提供巨额财政贷款，最后才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换取了苏联在未来德国盟约问题上的谅解，在边界问题上，科尔也向有关国家作出了一系列承诺，使问题得到解决。这位总理因此满怀喜悦地对外宣布：德国统一的所有条件已经具备，在1990年内将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令这位总理高兴的是，德国统一的具体日程比他设想的还要快，民主德国政府决定在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这样，赫尔穆特·科尔事实上成为统一德国的第一位政府总理。

科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4年，他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1984年、1987年和1993年，他又先后三次以总理身份出访了中国。他比较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并且努力寻求共同的政治利益。他为中德两国人民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架设了联系的桥梁。

科尔是幸运的，在他的几十年从政生涯中，他获得过许多桂冠。他曾是西德最年轻的州长，又成为联邦共和国最年轻的总理；他还是德国统一的最后实现者。

米·谢·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31 年出生，原苏联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末代总书记和主席；原苏联实行总统制时的首任总统，也是最后一届总统。

戈尔巴乔夫生于北高加索斯特夫罗波尔边区的普里沃尔耶村，父母都是农民。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戈尔巴乔夫的父亲和哥哥都上了前线。哥哥在战场上牺牲，战争结束后，父亲回乡当了康拜因收割机驾驶员，戈尔巴乔夫便一边上学，一边给父亲当助手。因为劳动出色，他在 1949 年荣获了劳动红旗勋章，1950 年成了苏共预备党员，接着被推荐上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戈尔巴乔夫入学两年后转为苏共正式党员。到大学高年级时，他已锻炼成了一个能言善辩、思想敏锐，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1955 年，临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方设法留在首都或者大城市。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和他的妻子，也是同学的赖莎一同回到他的故乡——斯特夫罗波尔边区。他认为，小地方虽然偏僻落后，但是，有用武之地。果然，他被分配到共青团斯特夫罗波尔市团委工作。第二年，由于办事干练，就被提升为团市委第一书记。由于拥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保持良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青云直上：1966 年，他升任斯特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68 年，任斯特夫罗波尔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 年，升任该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8 年夏，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突然病逝。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便推荐戈尔巴乔夫填补了这个空缺。1980 年，戈尔巴乔夫 10 月升为政治局委员，成了苏共高层领导中最年轻的成员。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病逝，68 岁的安德罗波夫当选为

总书记。他上台以后，开始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为此，起用一批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年富力强的。1983年初，戈尔巴乔夫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年2月，安德罗波夫因患肾炎住院，戈尔巴乔夫便代行管理一些外交和人事方面的工作，并且在重要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各大报刊上露面了。10月，安德罗波夫病情加重，只有其私人助手戈尔巴乔夫才能去医院看望。戈尔巴乔夫利用与安德罗波夫单独接近的特殊权利，通过他亲自提名，在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将一批亲信提拔到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些人后来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契尔年科任新总书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病逝。不过24小时，戈尔巴乔夫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议。当时，政治局10名委员中，有5名委员反对他，但其中有一名委员正在国外访问后的归途中，如果等反对他的人聚齐了再开会，麻烦就大了。果然，会议开始后，罗曼诺夫抢先提名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任总书记，总理吉洪诺夫等3名政治局委员立即附和。这时，葛罗米柯站起来，提名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群起响应。戈尔巴乔夫终于如愿以偿。

1990年2月5日，即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刚刚5年，也是东欧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的时候，他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废除宪法中关于保障共产党领导权的条款的决议，宣布允许各政党和反对派进行自由选举。3月3日，他又主持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决定实行总统制，他自己担任苏联首届总统。此后，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相继选出15个总统。这些总统上任后，立即宣布本共和国为“主权国家”，并要求苏联总统承认其独立。尽管戈尔巴乔夫也采取一些诸如经济封锁、武力威胁、政治劝诱，以及制定“新联盟条约”等旨在防止联盟解体的措施，但是为时已晚。

1991年“8·19”事变之后，苏共被宣布为“非法”，联盟解体的速度加快了。同年12月8日，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

钦为首的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了建立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宣布苏联“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12月18日，叶利钦又对报界说，“联合体内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到这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一个名义上暂时还存在的苏联的“光杆总统”了。12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特别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大会最后宣告：苏联在“法律上”已经消亡。具有70余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垮台和彻底解体。

鲍里斯·叶利钦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宣布独立。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把争取西方的援助、发展同西方的合作视为首要目标，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一个时期里，俄美关系密切，被称之为两国的“蜜月”时期。1992 年 6 月 15 日至 17 日，叶利钦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实现了历史上俄美总统间的首次正式“最高级会晤”。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华盛顿宪章》、《关于销毁战略武器谅解协议》、《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协议》等 15 个协议和七项联合声明。以这次访问为标志，俄美关系进入了由敌手向不平等的伙伴关系过渡的新时期。

1994 年 7 月，叶利钦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当着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并明确指出，他来参加这个会议不是来乞讨的，而是要求西方国家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平等的贸易伙伴，要求他们给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向俄国产品开放市场。叶利钦对美国的不满已溢于言表。1994 年 10 月，伊拉克曾向其与科威特接壤地区增兵，意在压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美国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再度对伊拉克动武。俄罗斯则公开表示支持伊拉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搞武力威胁。叶利钦不仅派外长到海湾地区搞调停，而且还在联合国展开活动，力图阻止美国对伊拉克采取进一步行动。俄美冲突还体现在：1995 年 5 月 1 日，克林顿突然宣布对伊朗实行制裁，并要求俄罗斯取消与伊朗达成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计划。叶利钦没有接受美国的要求。5 月 9 日，克林顿与叶利钦再次会晤，要求俄罗斯停止向伊朗提供用于建核电站的轻水反应堆计划。为了缓解美国的情绪，叶利钦同意取消俄

伊合同中的“军用”部分，不向伊朗出口可以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但也明确表示与伊朗的其他核合作项目将继续进行。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独立后，百废待兴，需要实实在在的朋友。

巴黎俱乐部是一个由西方债权国家政府组成的非正式官方机构，于1956年成立。其核心成员为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工业化国家，共有18名成员国，叶利钦对俄罗斯加入巴黎俱乐部一直高度重视。在他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1997年9月17日，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丘拜斯和巴黎俱乐部主席努亚耶在巴黎签署协议，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债权国成员。但到1995年底，俄罗斯的外债总额已达13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债最多的国家，至此，可以说俄罗斯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摆脱外债的沉重包袱的。因此，在与巴黎俱乐部达成延缓债务偿还协议的同时，俄罗斯也一直力争其作为一个大的债权国应享有的权利，这也是它与巴黎俱乐部进行了两年多谈判的核心议题。“紧紧抓住”欧洲及其火车头——法国和德国，实际上组成了非正式的欧洲“三驾马车”。

中国是俄罗斯的近邻。叶利钦认为，与中国搞好关系，无论在安全战略上还是在经济战略上对俄罗斯都极为有利。加强俄中合作，可改变中美俄关系中俄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可减轻美国对俄罗斯遏制的势头。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合作，也是叶利钦“东西方并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2年开始，以叶利钦访华为契机，俄中高层接触日益频繁。1992年12月，叶利钦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首次最高级会晤。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应叶利钦总统之邀访俄，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俄西部边界协定》，第一次把边界全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95年上半年，俄罗斯主动邀请江泽民主席参加俄罗斯“5.9”庆典。江主席出席庆典期间，俄罗斯表示甚为满意和欢迎，并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1996年4月，叶利钦在国内面临总统选举和身体欠佳的情况下，第二次访华，将俄中关系推向了一个新

的水平。双方决定成立“中俄友好、和平和发展委员会”。1997年11月，叶利钦第3次访问中国。叶利钦执政期间多次访华使中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使中俄关系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雅克·希拉克

法国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是戴高乐派的第三代传人。他在对外战略上，坚持戴高乐主义，将独立自主、维护法国大国地位作为法国的指导思想。希拉克主张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建立新的国际新秩序。他极力主张推进世界多极格局的发展进程，反对一极独霸世界。2003年年初，美国、英国等少数国家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前后，希拉克四处奔走呼号，呼吁国际社会阻止美英等国发动对伊战争，主张以和平与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法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在美对伊开战前及开战后，希拉克举起反战大旗，坚持反对立场，主张对伊动武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反对美国单方面对伊动武。法国的对外政策由总统和外长共同负责，而且总统占有主导地位。希拉克坚决反对美英联军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他坚定地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希拉克一直关注并毫不犹豫地“亲自介入”伊拉克危机问题。他千方百计地做工作，尽力避免人们走极端，同时他一再劝说萨达姆改变固执状态，向他讲明固执态度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一方面向伊拉克指明出路，另一方面也注意不破坏联合国安理会的团结。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外交平衡的谋略。希拉克运用这种外交谋略的目的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伊拉克问题，并尽一切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希拉克总统即刻发表电视声明，对于这个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而开始的军事行动，法国感到遗憾。他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结束，尽可能减少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伤亡。并承诺法国将继续通过集体行动，即在联合国框架内为那些流血或威胁世界秩序的危机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对于美英关于

在伊建立民事机构的战后重建决议，希拉克总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明确表示拒绝，并称这一决议无异于在实施军事行动后寻求国际合法化。

希拉克的反战立场和言论受到美国官方人士和媒体的大肆攻击，美国指责他挑头反对美国。美国一些地方还掀起了一股抵制法国葡萄酒、奶酪等法国商品的浪潮，要求布什政府对法进行政治经济制裁。但在法国国内，希拉克处置伊拉克危机的立场却赢得了法国朝野人士和公众的广泛赞同和支持，认为他是法国利益与和平事业的捍卫者，得到了政界的高度赞誉。希拉克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反战立场之所以会受到国内如此拥护，因为他是在坚持自主外交的前提下努力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去谋求法国的最高利益。希拉克在伊拉克问题上多次与美国较量，成功地阻止美国力图通过联合国授权美国攻打伊拉克，希拉克举起了反战大旗，这是法国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使希拉克和法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

希拉克强调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应坚持以集体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加强多边机构，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全球化进程必须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反对把一些国家排除在外，全球化必须重视世界上的文化、语言和物种多样性的现实。他主张加强欧洲防备和欧洲内部安全，制定真正的欧洲经济政策。希拉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张同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坚持以平等原则同美国打交道，认为双方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希拉克对中国情有独钟，尤其是对中国的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研究更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中国的诗歌是世界上最细腻的，为此，他对中国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词赞不绝口。希拉克称，他喜爱中国，从年轻时起就开始了接触令人神往、富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始终令他兴趣盎然，并总能使他从中获得新的发现。希拉克多次访华，除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外，他还遍访秦始皇兵马俑等中国历史文化古迹，他还多次参观在巴黎举办的中国青铜器展等一系列中国文化艺术展

览。在希拉克总统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已先后在法国举办了中国文化周和文化季。分别在法国和中国举行中国文化年、法国文化年。

希拉克多次表示，他是中国的朋友，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之情。他认为中国实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很好，获得了成功，他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得更好。他强调，“一个强大、进步、富裕的中国对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97年5月中旬，希拉克总统14年来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人们发现他与人们谈话时，主动握手，但不主动开始话题，他把讲话的主动权交给对方，自己倾听，然后表示意见，最后是鼓励或赞扬。与他交谈会使你充满信心。他这次访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1999年10月，希拉克总统邀请江主席第二次访法，并请江主席去他的老家科雷兹省参观。2000年10月，他应江主席邀请回访了中国。希拉克还多次通过热线电话与江主席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希拉克认为，中国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一极。法中是两个核大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两国可以共同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作为美国历史上在政府中任职最高的女性，她确有过人之处，是一位国际政坛上颇具魅力的人物。克林顿总统班底任职期满后，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之职，也已由人取代，红极一时的奥尔布赖特，已成为明日黄花，但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却会使人回味。

奥尔布赖特祖籍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5月15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名叫玛德琳，姊妹三人，她是老大，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出生不久，希特勒便占领了她的祖国。

1988年，一个偶然的时机，她认识了年轻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没有想到，几年后克林顿成了白宫的主人，这为她飞黄腾达，登上美国政权巅峰，开辟了一条捷径。

克林顿上台后，她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惟一的女代表。她曾踌躇满志地谈起自己的那些男性同行：“我既嫉妒他们，又同情他们，他们看起来太相像了。”她还面带微笑地向同行表示：“我很喜欢这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觉。”

在联合国大使的岗位上，她非常善于强行贯彻美国的政策。她曾桀骜不驯地说：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干什么，说到就能办到。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为维护自己的职权独立性，在一些问题上与奥尔布赖特产生分歧。她要把他拉下马，加利竟然毫无思想准备。当时的副秘书长、美国人约瑟夫·弗纳·里德曾悄悄对加利说，他听奥尔布赖特讲：“我会让布特罗斯认为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会打断他的双腿。”加利听到里德的这话认为“荒唐可笑”，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是太天真了。

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进行干预失败，她把责任推给当时的

加利。她几乎是在联合国单人独马向加利发动进攻，坚决要求加利离开联合国，她说，什么人说话也没有用，美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不可能妥协。她终于把加利赶下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

奥尔布赖特终于把加利从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她的强硬态度引起人们的震惊。自此她名声大振，可以说为她出任国卿打下了基础。

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要想取得高级职务，她必须花些时间同那些能够左右和影响决策的人打交道。1995年9月，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第四次妇女大会，奥尔布赖特率领美国代表团前来参加，她邀请了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名誉主席一同前往。

第二年，奥尔布赖特又有机会同希拉里同乘一架飞机，两人都去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参加在那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并作大会发言，第一夫人邀请奥尔布赖特一同前往。陪同两位夫人的有大卫·谢伐尔，两人之间关系之融洽给谢伐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是妙极了！”他说：“很显然她们之间关系密切，她们开玩笑、开诚布公地交谈。一会儿谈政治、一会儿谈家庭。她们两人都清楚什么议题重要，然后集中谈论。有时很幽默，有时很严肃。”

1996年12月，克林顿在成功地争取到连任后，马上给奥尔布赖特打电话，建议她出任国务卿。

于是，这位时年59岁的好战女性毫不犹豫地取代了此前一直由男性扮演的角色，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尽管美国妇女基本上争到了在各方面同男性平等的权利，但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过来，例如，在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两家是由妇女领导的，其他公司都是男人的天下，在美国政府中，妇女的任职仅占21%，而由妇女出任国务卿这种高级职务在美国史无前例。奥尔布赖特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先河，美国政界人士都拭目以待。

她上任后，首先组织班子，任命从大学时代就同克林顿深交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为自己的第一副手，这样，她又多了一条

同白宫联络的可靠渠道。

此外还任命了托马斯·波克林为自己的副手。托马斯·波克林是一位富有外交经验的外交家，她和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奥尔布赖特有这两位助手可称其为左膀右臂，她可得心应手地贯彻白宫的外交方针。

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可以说选对了“服从命令的得力助手”，她能圆满地完成总统的托付，必要时还在外交舞台上为他作“掩护”。当然，由于她受其工作性质——“服从命令”所囿，其自身的政治威望自然受到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现行对外政策的限制。

当今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人可分三派：一派是在越南战争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主张“从一切冲突中摆脱出来”；另一派是在海湾战争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主张“只参加那些仅动用海军力量，胜利可以得到保证的战争”。奥尔布赖特属于第三派，主张“立即解决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她认为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作风与其前任克里斯托弗完全不同，她辣味十足。1993年，当鲍威尔将军反对将美军派往波黑时，她曾当众痛斥道：“你总在谈论超级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些力量，那么我们有一支这么棒的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鲍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吓得我连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对如何解决科索沃问题，美国决策部门开始意见不一，克林顿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用轰炸把米洛舍维奇逼到谈判桌子来的想法不太实际。他的安全问题顾问塞繆尔·伯杰担心发动空袭会使科索沃局势复杂化。五角大楼里的一些人也对发动空袭持怀疑态度。

然而，奥尔布赖特积极敦促总统用“战斧”惩罚米洛。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的这场战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使美国在世界上获得了“胡作非为的超级大国”的坏名声。

现在人们要知道是谁决定对南联盟进行空袭呢？人人都知道这是奥尔布赖特的主张。在她的坚持下美国动用空军对塞族阵地发动袭击。但是让奥尔布赖特出任国务卿的是克林顿。

奥尔布赖特凭借美国的实力，曾不可一世，其地位之显赫、口气之大，从她在世界各地指手画脚的作风可见一斑。但是自从科索沃战争之后，她在华盛顿的影响逐渐下降，其权力也日渐缩小，似乎从巅峰状态滑了下来，在美国的报刊上也很少见到她的踪影。

美国《新闻周刊》以《冬日母狮》为题，在文章的开头将她称为“战争女人”。文章历数这位“面孔铁板的克林顿内阁主战派”的罪状：是她竭力促使进行 50 年来的第一场战争；是她因联合国秘书长不愿屈服美国的要求而把他赶下了台；是她在对不论左翼还是右翼国家的行为说三道四。奥尔布赖特总是把“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样的话挂在口上。在华盛顿政界，她被称之为“一条路走到黑的决策者”。

科菲·安南

科菲·安南，加纳人，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根据安理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安南先生连任下一届秘书长，安南先生就任秘书长后的优先措施是：通过全面改革方案恢复联合国的活力；加强联合国在发展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传统工作；鼓励并提倡人权、法治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关于平等、容忍和人类尊严的普遍价值观念；恢复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向新的伙伴伸手和套用他的话说，“使联合国更接近人民”。安南先生1938年4月8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他曾就读于库马西科技大学，1961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完成经济学本科课程。1961年至1962年，他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71—1972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员，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安南先生于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担任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后来，他任职于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在伊斯梅利亚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二期紧急部队）、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1987年至1990年）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1990年至1992年）。1990年，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秘书长派安南先生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协助撤出伊拉克境内的90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和西方国家的国民。随后，他又率领联合国的第一个工作队，同伊拉克谈判出售石油以购买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问题。

就任秘书长后，安南先生提出的第一个主要倡议是他的改革计划：“振兴联合国”。这项计划于1997年7月提交给会员国，此后一直继续推行，其重点是改进连贯性和协调。他多次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这个世界上处境最为不利的区域的承诺，包括在1998年4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曾在若干敏感的政治局势中进行斡旋，包括在1998年设法促使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1998年出差帮助促进尼日利亚过渡到文人执政局面，在1999年促成协议解决利比亚与安全理事会在1988年洛克比炸机事件上的僵局，在1999年以外交手段促成国际上对东帝汶暴乱的回应，核实了2000年9月以色列自黎巴嫩撤出之举，以及自2000年9月重新爆发暴力事件后进一步努力鼓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号与第338号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的歧异。

他还设法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并与对联合国的能力有所补益的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他呼吁缔结“全球协约”，由全球企业界和劳工组织与民间组织领袖人物参与，使全世界人民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和将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基本价值与做法引进全球市场之中。他在2000年4月以“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题，发表了千年报告，吁请会员国全心投入一项行动计划，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教育、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保护环境和保护各国人民免受致命冲突与暴乱。该报告后来成为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千年宣言》的基础。

秘书长在2001年4月发表了被他称为“个人优先事项”的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五点“行动呼吁”，并提议设立全球保健基金，作为一项机制，用作帮助遭遇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更多开支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分享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该委员会表示，这

一决定是为了表彰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该委员会还高度赞扬了安南自近五年前担任秘书长以来为联合国所注入的新活力、以及在消除贫困和与艾滋病和国际恐怖主义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布伦特兰夫人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以下简称布夫人），是挪威杰出的政治家，1981年出任工党政府首相，作为挪威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以后又多次受命组阁，先后担任首相达10年之久；她也是国际上著名的妇女活动家，1984年，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1992年，在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副主席，1998年5月，又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至今。布夫人是世界上一位享有盛名的领导人，在多个领域里做出并继续做着重要贡献。但她又是一个普通的人，能以平常心待人接物，在日常生活里助人为乐，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所以，在群众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挪威人亲切地称呼她“我们的格罗”。

布夫人自1974年担任环保大臣以后20多年间，一直重视国内环保工作，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东、南、西三方面邻国的工业污染所导致的酸雨对挪威树木、鱼类的生长造成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北方邻国核污染和核泄漏的直接威胁，一直困扰着每个挪威人的心。布夫人深切感到，保护环境是全球性事业，只靠一个或少数国家努力不可能完成。

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提名布夫人为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负责处理全球的环境问题。是否接受这一重担，她当时是有思想斗争的。其不利方面是今日世界环境污染严重，解决这样的全球性问题绝非易事。而另一方面，她担任挪威首相期间，有领导环保工作的经验。她认为地球是一个大家庭，保护地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自己不应退缩。最后她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在她的领导下，联合国“环发委员会”经过3年多的努力，

于1987年4月向联大递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指导方针和原则。例如：环境和发展问题涉及世界各国后代人的利益，要有一个长远规划；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不可分割，需综合考虑；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须进行广泛合作，等等。这些基本思想后来都纳入了1992年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发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宣言之中。现在，环保及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了。在这方面，布夫人功不可没。

1998年5月，布夫人在世界卫生组织180个成员中获得166票，以绝对多数当选为该组织总干事。她在就职讲话中提出，把大力消除贫困，救治疟疾患者，反对烟草工业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作为今后工作重点。她的讲话被11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挪威历史上先后遭受丹麦、瑞典的长期统治，到1905年才获得独立，当时经济相当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为交战国运输军火和其他货物，使挪威传统的海运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整体来看，挪威仍是欧洲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被人称为“欧洲的农村”。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挪威在北海发现油气并投产之后，情况开始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油气产量猛增，达到1.7亿吨，跃升为世界第二石油出口国。因此，挪威成为欧洲的“暴发户”，从资本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国内许多公司竞相到海外寻找市场。1994年11月底，挪威公民投票否决加入欧盟后，使之更感到需要与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经济增长迅速的亚洲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挪威的“亚洲构想”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提出来的。

1995年1月4日，布夫人应邀出席亚洲国家驻挪使节午餐会。她在午餐会上发表重要讲演，展望挪威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式提出“亚洲构想”。她指出：“亚洲惊人的经济增长以及伴生的新的政治向往，使亚洲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变得日益重要。”她强调挪威同亚洲建立长期经贸合作存在巨大潜力和必

要性，肯定亚洲在联合国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解决环境、人口等问题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她特别提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她提出挪威的“亚洲构想”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与亚洲国家加强政治磋商，发展经贸合作和促进文化交流。

布夫人提出的“亚洲构想”具有战略眼光，内容广泛又切实可行。几年来，在这个“构想”指导下，挪威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有了长足进展。在“亚洲构想”推动下，在中挪双方共同努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可以说出现了一个高潮：双方高级互访频繁，挪威议长、首相、国王先后访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李岚清、邹家华等先后访问挪威；双边经贸、科技合作增长迅速；文艺团体交往不断。

特别要提到的是，布夫人对挪中环保领域合作的关心令人感动。1995年11月，她在访华时同我国领导人会谈中提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环保问题应当早抓、抓紧。一些工业化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抓晚了，不仅环境遭到污染，而且整治花的钱更多，希望中国能注意这个教训。”我国领导人对布夫人的意见十分赞赏。在布夫人的支持下，挪威政府向中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用于环保项目的赠款和优惠贷款。挪威一些公司积极参与了中国不少城市和地区的污水处理、大气监测、古城保护等项目，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里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布夫人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后，多次访华，并表示卫生组织愿在戒烟和控制艾滋病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

布夫人是邓小平辞去党和政府职务后会见的少数外国领导人之一。她敬仰邓小平。1988年1月，布夫人第一次作为首相访华。访问前，挪威方面提出布夫人要求会见邓小平。考虑到布夫人的国际声望，邓小平破例会见了她。会见一开始，布夫人开门见山，向邓小平提了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最需要做的事是什么？”邓小平明确回答：“国内进行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国际上争取缓和。我们现在认为，保持相当长时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布夫人听了高兴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

仅推动了挪中关系，也对整个国际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在会见中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邓小平对布夫人说：“我今年 84 岁，该退休了。”但翻译误将 84 岁译成了 48 岁，引得宾主一阵欢笑。多年之后，布夫人见到中国客人时还常常提到这个插曲。

邓小平逝世后，布夫人当时已辞去首相职务，在中部乡村别墅撰写回忆录。当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非常悲痛。第二天便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在邓小平遗像前默哀、致敬。她激动地说，邓小平是她非常敬仰的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约翰·霍华德

约翰·霍华德，1939年7月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郊区。1962年，霍华德当上了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律师，1968—1974年成为悉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50年代自由党提出的反对共产主义、与美国结盟、企业自由竞争、家庭价值观等都十分符合当时霍华德的思想。他工作努力、行事正派、生活节俭，体现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价值观。1974年霍华德开始担任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议员，并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后来还在弗雷泽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商业和消费部长、贸易部长、国库部长等职务。1983年，他当选为自由党副领袖，1985—1989年任自由党领袖，1990—1995年任影子内阁劳资关系部长。1995年1月霍华德再次当选为自由党领袖。霍华德最崇拜的人是冷战后自由党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戈登·孟席斯。孟席斯当政后实现了澳大利亚战后经济的繁荣，享有很高的威望。霍华德认为，孟席斯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社会稳定，人人富有。因此他竞选时向选民承诺，将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舒适、轻松的社会。1995年至今任自由党领袖。1996年竞选成功，出任总理，当他搬进总理办公室时，甚至还请人把前工党总理基廷用过的办公桌搬走，换上孟席斯的办公桌。1998年10月和2001年11月大选中蝉联总理职务。

“既需要美国，又需要中国”是霍华德的重要对外谋略之一。

从这一外交战略出发，并考虑澳大利亚的处境，霍华德积极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2002年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将伊拉克、伊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这实际是在为后来公布“先发制人”战略造舆论。此后，布什多次谈到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许多著名学者撰文表示担心：一旦美国开此先河，其他国家可能纷纷效尤，国际准则必将荡然无存。就连美国

的盟国英国对此反应都较为谨慎。但澳大利亚却第一个站出来宣布直接支持华盛顿“先发制人”的政策。霍华德总理 2002 年 6 月的美国之行显示：澳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美国“先发制人”的决策。访美期间，霍华德在美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称，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他说：“在当今世界上，美国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澳大利亚更好的朋友了。”2002 年 12 月 1 日，霍华德在澳议会讲话更证明，澳大利亚不仅支持美国搞“先发制人”，而且澳自己也要效尤美国，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派军队到邻国去消灭恐怖主义目标。2 日，霍华德进一步说，联合国宪章“已经过时”，并公开建议修改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规，以便让成员国可以在情况紧迫时越界打击恐怖主义。霍华德的话在东南亚激起一片抗议浪潮。

霍华德的讲话有前不久发生的印尼巴厘岛恐怖爆炸事件的背景。印尼巴厘岛等地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恐怖爆炸事件，数百人伤亡。霍华德的讲话在澳国内也引起非议，有人说他自不量力，有人怨他引火烧身，有人则劝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谨慎行事。2003 年年初，正当美国重兵云集海湾地区，紧锣密鼓地准备大举进攻伊拉克之际，全球反战浪潮也不断高涨，澳大利亚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街头，人们高举着反战标语，喊着“不要战争”、“维护和平”的口号；在悉尼的大街小巷，坚决反对澳大利亚政府与美国结为“志愿同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尽管如此，霍华德总理还于 2 月 8 日专程前往美国，先后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布什，与美国结成“志愿同盟”，决定无论联合国授权与否，都将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以推翻伊拉克现政权。自称是美国“最好朋友”的澳大利亚始终愿为美国冲锋陷阵。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说，虽然没有寻求或获得澳大利亚的承诺，但他无法想像在冲突发生时，澳大利亚和美国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霍华德一直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他在 2002 年来华进行工作访问时说，他是惟一一位三次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30 年来，特别是近 5 年来，中澳两国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两

国人民间的往来日益密切，澳大利亚政府对此感到满意。澳大利亚祝贺中国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愿在中国筹办奥运会过程中提供帮助。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使澳具备独一无二的帮助北京的地位。他要求有关部门要做好一切准备，帮助北京做好 2008 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霍华德重视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深表钦佩，愿进一步探索和拓宽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中国现在是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并有可能在 5 年内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自霍华德 1996 年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以来，中澳两国的贸易增长了两倍，这是澳大利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澳方愿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大努力，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在经贸、教育、科技、金融、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互利合作。2003 年 10 月 24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了演讲。美国总统布什刚刚于 23 日也在这里发表了演说。布什在澳大利亚停留 21 小时后便离开了，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胡锦涛则在澳大利亚访问 3 天。他按惯例在澳大利亚久负盛名的港口城市悉尼作了一次巡游，还与澳大利亚商界人士共进工作午餐。此外，他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对一位中国领导人而言是不同寻常的举动。澳大利亚保守的《金融评论报》的大字标题是“布什来到了澳大利亚，胡锦涛征服了澳大利亚”。为了突出中国领导人到访的主要目的，中澳双方签署了一份价值 210 亿美元的意向书，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将拥有澳大利亚一天然气油田的产权股票，并在 25 年的时间内购买它的天然气。澳大利亚贸易部长马克·韦尔称，这份意向书（其金额比去年中澳两国签署的一份类似意向书的金额略高）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李肇星

李肇星 1940 年出生在山东胶南县（现为胶南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59 年夏，苦读寒窗十载的李肇星高中毕业，开始向一年一度的高考冲击。遗憾的是，他的文学梦恰恰在此时被无情地击碎。

李肇星报考的学校是饱经世纪沧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是李肇星填报的第一志愿，西语系英语专业则为第二志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北大却以他的第二志愿录取了他。毕业后，他荣幸地走向了外交官的工作岗位。

李肇星在 3 年的驻美国大使生涯中，他自己认为在任内最满意的是两国元首接触频繁，中美达成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协定，最艰难的时候是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就是在那一危机之中，李肇星被美国传媒认为是“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李肇星大使“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让美国印象极深”。

在轰炸大使馆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官方把它归咎于中央情报局的错误情报，从克林顿总统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从北约的将军到五角大楼的新闻发言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次失误，但对国人的无端遇难都没有丝毫内疚，反而要中国人保证美国驻华机构的安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克林顿等人在公开场所表示的“遗憾”、“歉意”是否出于真心。

美国领导人的这种表现自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美国媒体当时最关心在美国的美国人是否会有危险。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过电话专访了李肇星，请他讲述北京学生到美国大使馆游行示威的情况。ABC 电视网的著名主持人、驻白宫首席记者唐纳森（美国广播公司）则在专访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时一上

来就问，“你能保证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美国交人员的安全吗？”

李肇星表情严肃地回答说：“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

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唐纳森就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唐纳森接着问：你听到克拉克将军（北约最高指挥官）刚刚说过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李肇星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听到他谈这个问题，如果他或任何人试图掩饰这一暴行，那他就错了。我还要提一句，如果外国领导人认为，相信这种解释就可避免承担责任，那也是错误的。”

这场唇枪舌剑在几轮交锋之后终于结束，李肇星显然没有被两位名嘴的咄咄逼人攻势所吓，他有理有据地反驳了美国少数反华人士的不顾事实的言论，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为无辜受害的同胞鸣不平，同时也唤醒了美国社会的良知。

在那段李肇星自己都称之为艰难的日子里，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到普通的美国市民，都一直不断地听到中国大使悲愤的抗议之声。李肇星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他频繁地奔走于华府、媒介及民间各界，严正交涉、大声疾呼。

在1999年的那个黑色的5月，他是美电视新闻和专题节目上镜率最高的公共人物之一。在道义和悲情两方面，他都是成功的。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以后，面对李肇星的诘问，在他有理有据的利口力辞面前，在他代表着全体中国人的哀痛与愤怒的

激动情绪面前，美国社会也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一些报道和媒体观点开始出现了一些较客观的声音。这对后来中美之间最终达成有关善后问题的协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与美方交涉以外，李肇星还时刻与北京的最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在这一非常时期内处理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策略，他作为熟悉美国问题的专家和站在第一线的驻美大使，利用他的经验和老到的外交智慧，为决策层调整和重构对美关系的未来框架，对解决在那一时期相关的其他问题（如世贸谈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些报道称，李肇星在使馆被炸引发的中美危机那个期间的颇有成效的努力和审时度势的建言建策，曾深得中央高层的首肯。

李肇星在美国的三年期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促进中美贸易交往，扩大中美经济合作的努力。只要有贸易、企业、经济界论坛、会议，李大使都尽量出席，推销中国的市场，促成中美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多、更广泛的合作。当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利用所谓人为的问题试图延缓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时，李肇星立即发表讲话，认为这项有利于中美两国利益的法案之所以被延缓，完全是美国大选之际两党政治斗争的产物，对中美贸易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来，当这项法案终于通过时，李肇星又在里根国际易中心发表演讲，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在促使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得以通过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李肇星说，就他所接触到的美国有远见的人士，无论是从政者，是企业家或农场主，都表示无条件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认为这对美国也有好处。他们说，少数政客企图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为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制造麻烦，恰恰伤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在谈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时，李肇星，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产品和服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美国企业有更好地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机会。

作为中国出席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代表团副团长，李

肇星介绍了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会见与会成国部长、美国会议员、州长、工商商界人士的谈话情况。石广生指出，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协议是“双赢”的，对中国的经济有利，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对世贸组织和全球经济也都有利。

在即将离任之际，李肇星还专门前往硅谷参观访问，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开发考察调研，并广泛接触了当地企业界人士，显示出对硅谷高科技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高度兴趣。此外，华裔在硅谷高科技业员工中的比例之高、成功创业的范例之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大使与前总统布什新总统小布什父子都很熟稔，关系良好。在硅谷访问时，他向中文媒体透露，几天前他在德州休斯顿访问时，曾与前总统聚会，相见甚欢。从李大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中美两国今后的关系充满信心，对中美双边的经贸合作，更是持相当积极乐观的立场。

即使是对美国的广大中小型企业主，李肇星也没有忘记游说他们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他告诉纽约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年会的与会代表：美国中小企业在中国同样大有作为。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很多美国的中小企业做的是大生意，合作和投资都有很好的回报业绩。他以美国加州为例。这个州在 1999 年对中国的出口就增长了 9.4%，而加州地区对亚洲国家的贸易惟有在中国出现了增长，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在侨胞中间，他的人缘极好，被同胞们称为“贴心”。李肇星离任时，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在曼哈顿金丰大酒楼为李肇星隆重送行。纽约华人社团联合学会主席梁冠军在致词中说，李肇星先生 1993 至 1995 年担任中常驻联合国代表，1998 年至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旅美侨胞办了许多实事，给广大华人华侨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祝愿李肇星“步步高升、万事如意”。

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顾问刘忠生代表该委员会向李肇星颁发了最佳领导奖、最佳服务奖。多个侨团向他赠送了纪念匾

牌。

一位女作者以一篇散文诗为李大使送行，她深情地写道：“请代我们向长安街边的绿柳树，未明湖畔的迎春拜年，问声祖国好！”其殷殷挚情，令李肇星夫妇不禁动容。

穆阿迈尔·卡扎菲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国家元首，穆阿迈尔·卡扎菲自1969年9月1日执政以来，一直是受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风云人物之一。

利比亚是一个古老而苦难深重的国家。1969年9月1日，年仅27岁的卡扎菲上尉同他的“自由军官委员会”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没流血的政变，从此，他成了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

卡扎菲曾是阿拉伯统一的狂热追求者，他上台伊始，就推行以利比亚为中心的“泛阿拉伯主义”，向邻国提出进行“统一”与“合并”的要求。他先后向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了各种“统一”的方案。为实现这些“合并”，他制造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卡扎菲的一些做法引起了非洲国家的普遍不满，不少非洲国家都同利比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卡扎菲本人也成了一个“不合群的人”。为改善利比亚同阿拉伯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关系，卡扎菲采取了许多令人惊诧的举动，并产生了戏剧般的效果。

1988年4月7日，作为一国首脑的卡扎菲亲自驾驶着推土机推倒了利比亚—突尼斯边界线上利比亚一侧的艾季迪尔角边防海关大门，并下令撤走了部署在两国边境地区利比亚一侧的1个陆军师。1987年5月，巴解组织准备在阿尔及尔召开和解会议，卡扎菲两次把法塔赫代表及各反对派领导人召到的黎波里，亲自说服反对派向法塔赫的温和观点靠拢。1988年4月18日，卡扎菲邀请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访问利比亚，两人断交6年来首次言和。1989年6月，卡扎菲到卡萨布兰卡出席了他已久违15年的阿盟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举行了会晤，结束了长期以来的相互指责，并于同年10月相互签署

了 15 项合作协议，“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各国元首外出访问大多数乘坐豪华专机和高级汽车，而卡扎菲骑着骆驼去他国访问或参加重要会议却是平常的事。其实，卡扎菲有一个由青一色的高级防弹宝马车组成的庞大豪华车队。在 2002 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利比亚时，卡扎菲就是乘车前往江主席下榻的宾馆去举行会谈的。他骑马或骑骆驼赴会只不过是他的项独特的习惯而已。

卡扎菲的爱国激情、泛阿拉伯主义理想以及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促使他成为非洲反美斗争的领头人之一，也使他与美国结了冤家。他上台伊始，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1970 年，他宣布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这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当时美国在地中海与苏联角逐的前哨阵地。1972 年，他又宣布废除美国与利比亚旧王朝所签署的军事、经济与技术合作协议，使美国失去了在中东最大的一个立足之地。随后，他坚决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并表示，为了支持巴勒斯坦，利比亚要打击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卡扎菲认识到，一个小小的民族主义国家将没有任何前途，将不能独立生存。他开始放弃以利比亚为中心的泛阿拉伯主义，停止支持恐怖活动，改善和加强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开始在欧洲大陆上把外交作为和睦相处、减少饥饿、制止屠杀和消除战争的政治工具。与此同时，卡扎菲清醒地看到，“新一代”已开始在美国掌权，他作为一个对其国家命运负责的领导人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切机会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才能摆脱利比亚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使他的国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重新富有和强大起来。卡扎菲也深知，他同美国积怨已久，改善利美两国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开始谋划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策略与步骤，并决定首先取得联合国的谅解，让联合国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进而与美国修好。他选择了解决洛克比事件为获得联合国谅解的突破口。

卡扎菲在松动解决洛克比事件立场的同时，将改善同欧洲国

家的关系作为利比亚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他首先在解决西方国家人质问题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0年4月，在马来西亚一个休假胜地度假的21名西方国家游客被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伊斯兰武装组织劫持到了菲南部的霍洛岛作为人质。卡扎菲受德国和法国之托，利用他在穆斯林中的影响积极进行斡旋，据说利比亚还交纳了1000万美元的赎金，才使这些人质全部获释。有人称卡扎菲此举是“人质外交”，并将此举与1974年的中美“乒乓球”外交相提并论。这次人质问题的解决加快了利比亚同欧洲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有利于打破美国对利比亚的孤立。

卡扎菲为表明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诚意，在纪念利比亚“9·11”革命31周年时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同欧洲甚至美国实现和平与合作，克林顿总统为平息世界局势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9·11”事件之后，卡扎菲加快了与美国和解的步伐。在阿拉伯世界中，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谴责恐怖主义并向受难者致哀的领导人。

洛克比空难问题的解决以及卡扎菲一系列的友好行动虽为利比亚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美国却不买账，不仅端起了超级大国的架子，还摆出了不肯善罢甘休的姿态，因为美国最担心利比亚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目标是要消除这些武器。

卡扎菲没有放弃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同美英两国进行秘密谈判，消除美英对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疑虑，另一方面准备做出更大的让步。经过长达9个月的谈判，2003年12月19日，卡扎菲郑重地宣布，利比亚将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销毁化学及核武器，并无条件同意国际武器核查人员立即进入利比亚核查。

至此，卡扎菲的真诚终于让美英两国首脑无可怀疑。美国总统小布什也不得不称赞卡扎菲放弃发展违禁武器的举动，是朝着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承诺一旦得到履行，“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并许诺利比亚的诚意将“得到回报”。

卡扎菲做出以上决定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长期深

思和慎重抉择的结果。促使卡扎菲作出如此重大让步的首要原因是，他的国家需要从根本上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摆脱长期孤立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困境，必须回归国际社会，得到国际投资与经济合作，尤其是得到西方的援助，而让美国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是最关键的一步。同时，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各自的内政外交问题，多年的事实表明，卡扎菲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当阿拉伯世界的头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金正日

1994年7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主席突发心脏病去世后，时年52岁的金正日作为朝鲜劳动党既定接班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国际舞台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谋略展开外交，并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金正日特别注意与邻国全面修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发展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朝鲜与韩国同属一个民族，在近代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坎坷历程。南北人民盼望和平，盼望统一，然而受到了美国的长期阻挠。金正日认为，朝韩两方同属一个民族，只有团结和统一才有强大的力量。他主政后，积极致力于改善南北关系。他对金大中提出的“阳光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欢迎，为表达他期盼国家统一的愿望，金正日积极响应韩方关于实现南北和解与合作的提议，积极促进解决南北离散家属和南北互换特使问题。2000年4月10日，朝鲜宣布，将邀请金大中于6月12—14日访问平壤。这个消息举世震惊，因为这是朝韩双方首脑第一次会晤。在3天的高级会晤中，金正日始终表现得非常自然和风趣，甚至像英国人见面时谈天气一样同金大中谈美食，使韩方官员忐忑不安的心大大放松。金正日以自己积极的态度和独特的政治风范，巧妙地吸收了金大中“阳光政策”中的“双赢”部分，使这次会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成果，双方签署了《北南共同宣言》。该宣言强调：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主人是朝鲜民族，双方要团结起来，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方式促进南北统一。双方还决定交换离散亲属访问团，并通过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增进相互团结与信任。这次会晤不仅为朝鲜半岛走向统一打开了新局面，而且对朝鲜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具有重大意义。

金正日一方面全面与邻国修好，一方面与美国巧妙周旋。他

深知，朝鲜是个小国，面对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必须加强谋划，优化谋略，沉着应对。许久以来，美国一直企图将朝鲜纳入其“民主国家”的行列，使其成为它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的桥头堡。朝鲜则坚持独立自主及闭关锁国政策，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朝美争斗的核心问题是核武器和导弹试验问题。朝鲜将拥有核武器视为抵御美国攻击、保障自身安全及在国际上享有发言权的重要条件，美国不能容忍朝鲜作为一个核国家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也不能容忍朝鲜被怀疑有核武器而不受到核查。美国要求朝鲜执行1994年美朝核框架协议中的武器核查条款，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以使朝鲜核武器问题国际化。金正日面对布什的压力认真研究，沉着应对，利用核问题对美国“软磨硬抗”，巧妙周旋，迫美让步，从而扩大自己生存空间。

朝美核危机爆发后，金正日与美方一直围绕是先对话还是先“弃核”、是进行双边还是多边对话展开激烈争论，解决朝核问题因此一直陷入僵局。但从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在中国等有关方面的积极努力下，金正日的态度有所改变，解决朝核问题出现转机，先后成功地在北京举行了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会谈，朝核问题的解决由此出现了新的希望。2003年6月底以后，金正日的态度转变更明显，他决定由“斗争”重新回到谈判桌旁。改变了原来只同意与美直接谈判的态度，同意举行六方会谈。2003年8月27—29日，举世瞩目的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六方代表团团长们走到一起，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方握手镜头。首次六方会谈最大的成功是确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启动了和平解决进程。这次会谈为继续通过对话解决朝鲜核问题奠定了基础，向着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经中方反复做工作，第二轮六方会谈于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经反复磨合，各方对彼此的基本立场都比较了解。会前各方进行了密集的穿梭外交，出现了一些初步的良性互动。比如美国表示愿意考虑给予朝书面安全保障，朝鲜表示愿意考虑。朝鲜提出了核冻结的新建议，美国给予了积极评价。这些都为本

次会谈开展建设性和实质性磋商创造了条件。人们感到，各方代表少了一些刻板，多了一些笑容，谈话态度平和，对会谈的评价比较乐观。这次会谈将启动实质性的讨论，标志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与第一次六方会谈相比，第二次六方会谈已经显示出不少新的特点。会谈取得了某些可贵的进展：即成功推进了实质问题的讨论；明确了采取协调一致步骤解决问题的方式；发表了启动和谈进程以来的首份文件，即会议主席声明；确定了第三轮会谈地点和时间；同意建立工作组，推进会谈机制化等。

第三轮六方会谈于6月23日26日举行。此轮会谈开幕前，会议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概括了中方与会的十六字方针，即：“坚定目标、巩固成果、积极斡旋、稳步推进”。这次会谈是务实、积极和建设性的，达成了一系列新的共识，向无核化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既定目标均已实现，各方面都表示满意，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谈。第三轮会谈各方都带了高层批准的较详尽的方案，“家庭作业”十分充分，手里有“货”，团长们脸上因此多了一些自信和坦然。新方案的出台，提供了不少新设想、新思路，为会谈增加了动力。会谈中，针锋相对、全盘否定的情况没有出现，各方对他方的方案采取了尊重、包容和建设性的态度，给予了初步积极的回应。

以往会谈中，朝美双边会晤问题高度敏感，而现在双方已能够自然、自主地实现接触。在第三轮会谈前，东北亚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两次访朝，两国在绑架人质问题上的僵局解冻。朝韩各层次接触频繁，还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将军级会谈，搞了海上信任措施合作。韩国总统卢武铉重登总统宝座，主张南北和解的力量取得压倒性优势。美国国内选举是最大的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是紧迫的挑战，因此稳定压倒一切，不希望东亚和朝鲜半岛再出乱子。当然，六方会谈从来都充满悬念、起伏不定、难以预测。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巴基斯坦和印度是南亚次大陆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大国间的关系。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撤出南亚次大陆之际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埋下的祸根，印巴两国长期相互对立，并且爆发过3次大规模的地区战争，给本地区特别是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不仅是一位在战场上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一位很有战略头脑的外交谋略家。他认为，巴印两国不能长期对峙下去，而要捐弃前嫌，友好和睦。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环境，共谋发展。长期以来，穆沙拉夫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并注意寻求良好的机会，与印度改善关系。

早在2001年5月29日，穆沙拉夫总统致信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表示正式接受印方向他发出的访印邀请。同年7月14日至17日，穆沙拉夫总统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穆沙拉夫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后对新闻界说，他是带着一种“开放的思想”到这里来的，希望就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与印度领导人进行“有意义的、坦率的和实质性的”讨论。但由于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仍存分歧，最终未能打破僵局。更为不幸的是，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印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政府与此案有染，两国关系骤然恶化，特别是两国都在边境地区屯集重兵，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关乎两国命运和地区安全的危急关头，穆沙拉夫从巴印两国的根本利益与安全出发，以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重，积极主动向印度做出友好表示，力主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避免爆发大规模战争。他利用出席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之机，主动向印总理瓦杰帕伊伸出友谊之手。2002年1月5日至6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七国首脑会议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举行。2002年1月5日上午，南盟首脑会议开幕。当穆沙拉夫在讲台发表演讲时，全场屏息静听。他在演说结束时说：“女士们，先生们，在我走下这个讲台之前，我希望能利用这次论坛，向瓦杰帕伊总理伸出真正的诚挚的友谊之手，让我们一同开启南亚和平、和睦与进步的旅程。”接着，他走下讲台，径直走向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座位，并伸出了手。他的这种友善之举，这种努力寻求和平的友好姿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此次会议之后，穆沙拉夫又不断发表讲话，阐述巴希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与印度争端的政策。他承诺，如果巴基斯坦政府发现可靠证据证明巴基斯坦人参与了印议会大楼被袭事件，巴基斯坦将“会在自己的国家审判他们”。印度不少媒体和分析人士对穆沙拉夫的讲话持肯定态度。2002年7月28日，穆沙拉夫总统辗转向印度总统卡拉姆和总理瓦杰帕伊分别赠送了10箱金芒果，这是象征和平的贵重礼物，是瓦杰帕伊向印度领导人表达和解的良好诚意。

2003年4月23日，针对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视察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时说印愿意就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但巴在克什米尔地区必须彻底停止越界渗透和恐怖活动，穆沙拉夫再次在伊斯兰堡发表讲话，表示巴准备与印度就克什米尔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全面对话。穆沙拉夫还在讲话中指责印度推行的地区政策，称印度炫耀武力的“不明智的”政策及其拒绝对话的做法破坏了地区安全。穆沙拉夫在谈及巴印关系时虽然言语谨慎，但思维相当敏捷，还经常来点黑色幽默。一次，一位印度记者采访穆沙拉夫时，提问“你能为南亚地区做一些事情吗？”穆沙拉夫笑着回答说，“当然，我很愿意。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一只巴掌拍不响，我需要印度方面的帮助啊。”

在穆沙拉夫努力下，美国为了反恐斗争的需要，也逐步将其南亚政策由“重印轻巴”调整为“印巴并重”，全面取消了对巴的经济和军事制裁，从而使美巴关系得以迅速升温。

“9·11”事件后，美国实施以反恐为主的全球战略，将目标对准了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巴基斯坦

是阿富汗的邻国，长期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行“友好政策”，两国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巴基斯坦成为国际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美国要求巴基斯坦协助其攻打阿富汗，遭到巴国内不少人的强烈反对。穆沙拉夫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压力，称当时的巴基斯坦正面临着自 1971 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以来最危急的时刻。

在这种情况下，穆沙拉夫一方面做国内人民的工作，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政府共同渡过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果断地调整外交战略，完全放弃了对塔利班政权的“友好政策”，积极支持美反恐和对阿动武。激起了巴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分子的不满和仇恨，为此，穆沙拉夫险遭暗杀，其人身安全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由于对塔利班政策的转变以及对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打压，穆沙拉夫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和追随者。

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穆沙拉夫还注意与布什总统建立和发展私人关系。2002 年 1 月 13 日，布什总统在看电视时突然晕倒。听到这一消息后，穆沙拉夫总统在第一时间给白宫打去电话：“总统先生，我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据报道，穆沙拉夫是第一个慰问布什的外国领导人。

巴基斯坦媒体指出，穆沙拉夫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沉着应对，及时做出决策，果断改变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政策，积极配合美反恐，虽然导致国内不满，但也使巴顺利渡过了难关，并为巴经济、外交带来转机，不仅缓解了巴国内经济窘况，而且为巴争取西方外援、改变国际形象赢得了宝贵时机。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由于前苏联时期长期奉行的“分工合作”政策，吉尔吉斯斯坦国民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固有经济联系，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连年大幅度滑坡。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吉原本捉襟见肘的经济雪上加霜，2000年11月，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在顺利蝉联总统后不久即在议会发表国情咨文，建议将2001年定为“支持和发展旅游年”，要“打开国门迎四方来客”。这既是阿卡耶夫的外交谋略，也是他迅速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决策。

阿卡耶夫一直致力于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他认为，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友好邻邦，与中国大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大大有利于吉尔吉斯的经济的发展。他多次强调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永远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友好邻邦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要世代相传下去。他认为，过去10多年是吉中两国关系发展重要时期，双方建立了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密切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阿卡耶夫总统高度评价中吉双边关系的长足发展。阿卡耶夫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国际知名政治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江泽民主席多次会见阿卡耶夫。他高度评价中吉关系发展。他说：“我们签署了中吉国界协定，全面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吉、塔还签署了三国国界交界点协定，这些都体现了双方加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决心，也标志着长达1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将真正成为联结中吉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纽带。我们高度评价总统阁下本人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保障经济稳步发展，阿卡耶夫对反恐怖斗争十分重视，重视国际反恐怖合作。他对独联体国家在莫斯

科组建的反恐怖中心以及准备设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反恐怖中心寄予厚望。阿卡耶夫高度评价“上海五国”元首会晤对于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卡耶夫指出，在“上海五国”框架内建设性合作机制正在成功运作并已取得积极成果。五国元首 1999 年的比什凯克会晤后成立了由五国执法机关和特工机构领导人参加的“比什凯克小组”，就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打击毒品走私和武器贩运等犯罪现象展开了积极工作，各国支持吉方在比什凯克成立地区反恐怖中心的倡议显得尤为重要。阿卡耶夫说，“上海五国近年来卓有成效的活动吸引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与该组织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国际威望、与我们成功解决政治、军事、经贸和其他领域存在问题及在保障地区安全问题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不无关系”。

2002 年 6 月 24 日上午，北京大学授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阿卡耶夫总统发表了题为《源远流长的友谊》的演讲。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1944 年月 11 月 10 日出生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克明山谷，是吉尔吉斯古代著名的部落首领塔加依比的直系后代。少年时代对物理极感兴趣。他自己制作了不少飞机模型，中学毕业时，获得全苏金质奖章。对当年的苏联中学生来说，获得此奖极为不易，获得此奖者可免试进入苏联任何一所大学。后来他进入了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和光学学院。这所学校在当时是全苏一流大学。吉尔吉斯是当时的一个共和国，地处偏僻，阿卡耶夫刚上学时，俄罗斯人根本看不起他。可经过一个学期后，人们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他很了不起。他门门功课得优秀，他的论文获得全苏大学生作品竞赛一等奖。阿卡耶夫迅速成长为苏联高科技的“精英”，被誉为光学计算机技术这一新型科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1977 年获吉尔吉斯列宁主义共青团奖金。1984 年获吉尔吉斯斯坦通讯院士称号。1986 年起，任吉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1 年 10 月在吉尔吉斯独立后首次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后多次连任至今。人们认为，阿卡耶夫是个知识型、开放型的总统。

格哈德·施罗德

联邦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政府总理，同时也是一位言而有信的外交家。他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信条是：力求做到“言而有信，始终如一，言行一致”。

格哈德·施罗德 1944 年 4 月 7 日生于德国北威州德特莫尔德市莫森贝格镇，1963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66 年至 1971 年在格丁根大学法律系进修法律专业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1972 年至 1976 年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并获得律师资格。施罗德 1978 年至 1980 年担任社民党青年组织主席，1980 年至 1986 年当选为联邦议员，1989 年起为社民党主席团成员，1986 年至 1990 年任下萨克森州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990 年至 1998 年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1998 年 9 月 27 日，在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当选为德国总理。2002 年 12 月 21 日，施罗德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欧洲新闻人物。

施罗德主张，国与国之间要通过和平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不能动辄付诸武力。2002 年 9 月，正当美国正紧锣密鼓准备对伊拉克动武之际，一则有关德国司法部长将布什的做法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报道，使布什大为恼火。施罗德总理对布什表示道歉。他致信布什说：“我想告诉您的是，对于德国司法部长的言论冒犯了您这一事实，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向您保证，我的政府中绝不允许存在将美国总统与那样一个罪犯联系在一起的人。’道歉归道歉，但德国反对美国等国对伊拉克动武的立场决不改变。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多次在国内外不同场合表示了反对美对伊动武的强硬立场，并从外交上最大限度地联合法、俄、中等国对美、英、西“打伊倒萨”进行牵制。

与西欧其他大国相比，中德建交相对较晚，但两国关系的发展

却后来居上。经贸关系名列欧盟榜首。中德贸易额相当于中国同欧盟 15 国贸易的 1/3 左右，超过英法两家同中国贸易的总和。发展合作卓有成效。德国自 1982 年起向中国提供无偿的“技术合作”资金，从 1985 年起提供软贷款性质的“财政合作”，迄今两项合作进展顺利。联邦政府还结合大项目提供专项贷款或混合贷款。这种合作对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善基础设施、扶贫脱贫、环境保护、培训人员以及大项目合作起了促进作用。施罗德认为，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方面表明了德国政府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善意，但同时也帮助了德国扩大工业产品市场和增加就业，因而是一种互利互惠双赢的合作。施罗德支持中德两国在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自 1978 年两国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定》以来，科技合作官民并举，遍及各个领域，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格局，双方都获益匪浅。两国教育合作硕果累累。德国是中国派遣留学人员最多的欧洲国家。目前中国在德国的留学人员多达 1.2 万多人，德国洪堡基金会每年对外提供的 500 名奖学金名额中，中国占 13%，位居各国之首。德国近 87 所大学与中国近 200 所大专院校建立了校际关系。两国文化交流相当活跃，实现了若干规模大、吸引力强、影响广的项目，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了重要作用。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遍布全国。德国各州在中国都有对口的合作伙伴，双方交往疏密不尽相同，但多数运行良好，促进了人员交流和相互了解，推动了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中德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许多有利因素。两国之间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地缘政治上也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特别是中国重视同欧盟发展长期、稳定、健康的合作关系，而德国在欧盟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德关系的发展可以带动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有利于德国同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经济上互补性强。德国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科技水平高，产品质量安全可靠，在职业培训和管理经验方面有独到的优势，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容量极大，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余地很大，发展合作的前景广阔。

施罗德对中国友好也是“言必信，行必果”。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正值中国人民群情激愤谴责北约之时，施罗德作为西方第一个国家首脑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中他反复就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暴行表示了“五条件的道歉”。施罗德代表德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遗憾。

施罗德很重视发展与俄罗斯这个大国的关系。在近几次首脑会晤中，两国建立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不只是使俄罗斯更加牢牢地扎根西欧，而且也有益于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合作。施罗德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正在通向现代化变革进程中的大国。俄罗斯有各式各样的邻居，这是巨大的挑战，必须用新的手段来应对这个挑战。在致力于实现欧洲持久安全与稳定方面，俄罗斯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联邦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和大西洋联盟、欧盟中的伙伴一起共同与俄罗斯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经得起考验的、持久的安全伙伴关系。

德、法两国都是欧洲大国，虽然在历史上两国曾有过不幸的经历，但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两国密切合作，对稳定欧洲局势，反对霸权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施罗德深知这一点。他始终主张与法国密切进行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大业。2004年新年伊始，德国政府宣布，施罗德总理应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邀请，参加今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一直是法德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也是两国领导人的“心结”。法国这次历史性的邀请和施罗德的积极回应，标志着法德两国更加密切的合作的开始，也预示着“老欧洲”更加亲密无间。尽管欧洲在伊拉克问题上显得步伐凌乱而暗流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伊拉克战争，德国与法国空前一致地走到了一起，这对欧洲的整合意义重大。

卢拉·达席尔瓦

2002年12月14日，对于卢拉·达席尔瓦来说，是一个最值得高兴和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接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正式确认他为巴西第40任总统。他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总统，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卢拉接过证书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2003年1月1日，卢拉·达席尔瓦在国会大厦举行隆重总统就职仪式，他庄严地从卸任总统手中接过绶带，正式成为巴西联邦共和国第40任总统。卢拉早年受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拉美左派思潮的影响，曾是一位激进的斗士，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他曾毫不留情地抨击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前3次总统竞选中，卢拉激烈的“反美”言辞让华尔街的大亨们感到恐惧，使在巴西多有投资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公司心存忧虑。他们想方设法，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卢拉当选。然而，卢拉在吸取前3次竞选失败的教训后，在2002年的第4次竞选中，开始改变激进的左派代表的态度，不再抨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经济政策，承认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巴西经济的作用，主动改善与美关系。他还选择巴西自由党领袖做竞选搭档，以争取美国 and 国内外商界的认同。卢拉明智地看到了这些因素，开始以务实的态度与布什政府打交道，与美国建立和谐的外交关系与往来。早在2002年7月，卢拉就派遣经济顾问访问华盛顿向美国政府解释未来的经济政策以换取支持。12月他亲自出访华盛顿，会晤布什总统，重申承认债务、稳定经济的承诺，争取美国为巴西的“反饥饿运动”提供贷款。他当选总统后，又任命了符合美国和国际金融界意愿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巴有争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卢拉态度已有所软化，从坚决拒绝，到同意进行自由

贸易区谈判。美国原担心卢拉执政后对美立场强硬，在美国后院形成又一个反美核心，影响其实现全球战略。面对卢拉对美态度转向温和务实，美国对卢拉的态度也来了 180 度的大转弯，从开始“打压”、进而“默许”，到最后进行“拉拢”。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合作，是卢拉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作为巴西左派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天然的阶级情谊”。1974 年巴中建交以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并且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航天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成功发射了两颗地球资源卫星，并正在继续研制第三和第四颗卫星。两国经贸关系近几年发展迅猛。中国已经成为巴西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2004 年 5 月 22 日晚，巴西总统卢拉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 6 天的国事访问。随同卢拉总统来访的有 420 多名巴西企业家组成的巴西商务代表团，创下巴西总统出访随行人数的最高记录。除了庞大的商务代表团，与卢拉总统同行的还有外交部、发展工商部、旅游部、能源矿产部的多位部长。可以说，影响巴西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都来了。据统计，巴西是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巴西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003 年，双边贸易额达 79.89 亿美元。5 月 23 日，卢拉总统参加了巴西石油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揭幕仪式。这家石油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20 家石油公司之一。巴西石油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成立后，巴西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将从以前的每年 200 万桶猛增 6 倍，达到每年 1200 万桶。巴西将成为中国又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卢拉总统访华期间还接受了中国旅游局递交的“旅游目的地”文件，巴西有望成为中国公民的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国。

卢拉在评价他 2004 年中国之旅时说，这是“巴西政府一次伟大的旅行”。借着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中国的契机，中巴两国政府在工业、商业、科技等方面建立起广泛合作，这将极大地改变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均衡状况，也将对两国自身的发展起到明显推动作用。中巴两国签订多个合作协定标志着亚洲和拉美两个大国将在经济互补和双边合作方面更进一步寻求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中巴

两国间的合作边远离国际经济旧秩序里的掠夺和依附关系，更冲破了美国凌驾于拉美国家之上的不平等的经济局面。《波士顿环球报》载文称，卢拉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再一次体现了卢拉“灵活务实”的外交谋略，卢拉政府积极的态度发展对华关系，这是由卢拉总统所确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决定的。巴西对外关系研究所所长萨拉伊瓦指出，卢拉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平衡外交、提升双边关系地位和（巴西）国际作用普遍化。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巴西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其中的大国发展关系。中国、印度、南非和俄罗斯被巴西列为重点发展关系的对象国。巴西这样做，欲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在经济方面，增加与上述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实现卢拉总统本人提出的改变“巴西贸易地理”的目标，减少巴西出口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在国际政治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沟通，通过国际作用普遍化的逐步实现，最终完成“巴西需要在世界上占据突出位置”的目标。卢拉以左派身份当选巴西总统后，在国际舞台上往往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而自居。卢拉总统访问南非、印度、中国，以及对其他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与印度、南非结成三国集团，在坎昆会议出面组织 20 国集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巴西为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

比尔·克林顿

在阿肯色南部黑人居住地带，有一个叫做霍普的小镇，1946年8月19日，比尔·克林顿就出生在这里，而他的生父早在3个月前，在经商归来的途中翻车而身亡。

1984年初，克林顿宣布竞选连任州长之职，并以64%的选民支持率连选连任阿肯色州州长。阿肯色州法律并未规定州长连任几届的限制，在他之前只有两位州长曾干过3任。这时的克林顿已变得更加圆滑和更加自信，并着手“塑造阿肯色州的未来”，使阿肯色州跻身于美国先进州的行列，成为不亚于任何州的发达州。

1986年克林顿宣布再次竞选连任州长，并以压倒优势击败来自两党的对手。他之所以能第四次获得阿肯色民众的多数选票，关键就是在他当州长期间落后贫穷的阿肯色州面貌有所改变。

克林顿在阿肯色顺利地做完了第四任州长。1990年3月他决定争取连任第五任州长，并十分自信地说：“我知道许多人都认为我当州长已经当得够长的了。可是，我认为与其他人相比，我继续当州长最合适。”

他于1991年8月15日突然辞去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之职，组成一个顾问小组专门帮他研究参加总统竞选的可行性问题。他的另一步棋是与在民主党内颇有影响的黑人领袖、自由派代表人物杰西·杰克逊和解，这为民主党实现团结扫清了绊脚石，也为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开辟了道路。

1992年11月3日清晨。一架波音727客机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机场降落。舱门打开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出现在机舱门口，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

24小时之前，克林顿和他的竞选班子包租了三架波音727客机，于2日出发，先后到宾夕法尼亚等8个州进行了大选前的最后

一轮竞选，这8个州大多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争取这些州的选民对克林顿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拥有任何总统候选人要获胜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的一半。在29个小时的闪电式竞选旅行中，克林顿没有睡上一觉。当日晚9时45分，部分投票结果显示：克林顿所得普选票为44%，已处于领先地位，午夜过后不久，终于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大局已定，克林顿获得全部538张选举人票中的370张，以压倒多数击败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乔治·布什和独立候选人、亿万富翁罗斯·佩罗，当选为美国第42任总统。

1993年1月20日，47岁的年轻新总统站在国会山前，踌躇满志，宣誓就职。克林顿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憧憬着他连任下届总统的梦，开始实现他当一名“致力于变革的跨世纪美国总统”的政治生涯。

但是，在国内外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面前，他如何实现竞选诺言，不让选民失望，使经济迅速回升，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阻止美国综合国力下降的趋势，保住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将是对他的严峻考验。克林顿接管的是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无疑，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变革能否成功将决定200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克林顿断言，没有强大的美国经济，就没有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美国经济虚弱，就不可能在外国强大。因此，必须把重振经济摆在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

对克林顿来说，1994年是其施政的关键性一年，特别是许多重大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其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任内的业绩，还将直接影响到1996年的总统竞选。但早在这年3月中旬，新闻媒介就捅出了克林顿夫妇很早便与一家房地产公司有经济方面的往来，该公司叫白水门公司，是在克林顿州长的庇护下经营的，克林顿还曾用其职权向该公司优惠贷款，因而该公司倒闭之后，被查出有诈骗银行的嫌疑。

但无论如何，自克氏上台以来，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比如，长期利率、通胀率以及失业率都有微弱的下降趋势，国内生产总值则有一定的提高。另外，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设备投资都在好转，汽车销售量增加，建筑业开工率提

高，消费者支出在增加。所有这些表明，美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美国都走在日德前面，这些对克氏来说，显然都是有利的。

克林顿的外交重点开始明显地向亚太倾斜。克里斯托弗曾说，“对美国的利益而言，没有比亚太地区更为重要的地区了”，“亚太乃是影响克林顿总统国内日程的关键性地区”，而克林顿的首次海外之行在亚洲，并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议，并于1993年借担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轮任主席的机会把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合作会议部长级例会升格为首脑会议。此次会议上，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自1989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由于美国一味强调其对外战略中的经济利益，甚至强迫贸易对手硬性作出某些让步，以至引起欧日的强烈不满，再加冷战的结束使欧、日对美的依赖相对减少，欧、日在经贸问题上也开始对美采取日趋强硬的态度。这种经济上的摩擦与冲突，势必危及到双方的政治关系，给它们在二战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盟友关系罩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作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强调其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世界事务的干预，如在波黑问题上，除了扩大经济制裁、建立审判“种族清洗”罪犯的国际法庭、搞禁飞区和空投救济物资外，还建议解除对穆族武装的武器禁运和对塞族阵地实施空中打击，但在英、法等北约盟国的反对下，克林顿便犹豫不决起来。他这种为适应冷战后新形势和美国国情，而试图实行的一种有选择卷入的适当收缩方针，给人留下了一种软弱的形象。因而克林顿政府不久便强调，“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在行动上也有意显示美国的强硬形象。

在克林顿即将下台前夕，美国的一些民意测验显示赞成他的政策的人竟占美国总人口的70%左右，比当年深孚众望的里根总统还高。2001年1月20日，随着乔治·W·布什就任美国第43届总统，比尔·克林顿告别了白宫。不过，克林顿现在年富力强，说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为时太早。

卢武铉

2003年2月25日，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的就职仪式在汉城国会大厦前隆重举行。卢武铉总统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迎接和平、繁荣、飞跃的新时代》的就职演说。卢武铉在演说中提出要把东北亚发展成为“繁荣的共同体”和“和平的共同体”。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卢武铉提出了新的对朝政策、与美国建立平等互利关系以及与邻为善的各项对外政策。

卢武铉在竞选总统时就曾发誓要继续贯彻执行其前任金大中总统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就任总统后又多次重申他的竞选承诺，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举行首脑会晤以解决核危机问题。卢武铉说，加强对话和经济交往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惟一办法。他认为，继续实行“阳光政策”是一种新的阳光政策。他将这一政策称之为“和平繁荣政策”，他要以这一政策进一步确立半岛和平机制。这一政策的实质是金大中“阳光政策”的延伸与发展。韩国舆论和半岛问题专家认为，卢武铉上台后提出了新的对朝战略：在继承金大中对朝和平、和解、合作政策的基础上，把改善和发展韩朝关系提升到迎接“东北亚和平与繁荣时代”的高度进行处理和对待。这是卢武铉在对朝政策上的新发展，这一政策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为迎接东北亚时代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卢武铉把对朝外交方针定位在“增进和平、共同繁荣”上，强调“开启东北亚时代首先要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要把朝鲜半岛变成一个和平的地区，变成东北亚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和平通道。卢武铉的对朝外交战略体现了“理念与原则并存”。所谓理念指的是，不仅要进一步改善和发展韩朝关系，而且还要在和平与共同繁荣的进程中，共同为东北亚时代的来临作出各自的贡献。所谓原则指的是，卢武铉提出了确保对朝战略落到实处的4大原则，即要通过対

话解决南北一切悬案问题、首先要相互信赖并坚持互惠、以南北当事者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良好合作、提高对内和对外的透明性，扩大国民的参与并争取超党合作。关于朝鲜核武器问题，卢武铉认为，“平壤必须放弃研制核武器。是继续谋取核武器，还是为其政权争取安全保障和国际经济援助，这取决于平壤。”卢武铉强调，核问题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并说他将继续奉行其前任金大中的和解政策，多与朝鲜进行经济和人权方面的交流。卢武铉认为，朝鲜半岛应该再次成为将欧亚大陆和太平洋连接起来的东亚“和平门户”。卢武铉准备与朝鲜进行史无前例的经济合作，条件是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并放宽对朝韩边境的管制。卢武铉准备规划一个“宏伟的前景”，使韩国和北朝鲜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前提是平壤同意进行全面改革。卢武铉制定了一份新的构想，这一构想主张：先举行南北首脑会谈，并在2006年以后签署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卢武铉发展韩朝关系的新构想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举行南北首脑会谈，建立军事信任关系，同时推动美中日俄向北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并督促北朝鲜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一揽子解决核问题；第二阶段（2004~2005年），推进北朝鲜与日美关系的正常化，将美韩同盟发展成为“面向未来”的关系；第三阶段（2006年以后），缔结和平协定，改变驻韩美军的职责。

卢武铉在2003年2月25日的就职演说中称，朝鲜半岛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韩国与朝鲜何去何从，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卢武铉为了确保朝鲜半岛和平，将会把调整韩美关系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他说“将确保韩美同盟发展成一种更加互惠和平等的关系。”卢武铉表示，“很难对美国多加指责，但韩国民众应具有坚定的意志。经济再困难总比爆发战争要强很多倍。卢武铉及其周围人士还对美国正在讨论的对朝制裁措施持否定态度，从而表现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差别。卢武铉认为韩国不可能像富裕并发达得多的西德那样做，西德在1990年吸收了东德。他还认为军事行动可能引发一场使他的国家深受其害的战争。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的金胜翰说：“卢武铉反对用制裁和武力手段解决危机，华盛顿则保

留了使用所有手段的权利。对卢武铉和布什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缩小双方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确保半岛和平，必须将调整韩美关系作为今后韩国对外工作的重点。卢武铉坚决反对美国孤立朝鲜的政策。卢武铉反复强调要在朝核问题上“发挥韩国的主导作用”。他的讲话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在否定韩美同盟。但是，由于朝鲜宣布退出防止核扩散条约，朝鲜的核问题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大问题，卢武铉不得不以对美关系为核心，采取与国际舆论协调一致的态度。韩国国内外有不少人担心卢武铉可能“反美”或“不喜欢美国”，但是卢武铉一再强调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他说：“韩美同盟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重要的。”“只是部分人反美”，“将来也需要美军驻留韩国”。

卢武铉政府鉴于布什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采取更加务实外交谋略，对外工作的重心将逐步向东北亚地区倾斜，改变以往对美不敢说“不”的一边倒政策。为此，卢武铉反复强调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同时，积极探讨建立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体系的必要性。

卢武铉认为，为了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的不断改善必须积极发展韩日共助关系。历史问题是影响韩日两国关系的“决定性问题”，但韩国新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韩日双方商定将尽快建立常设事务级磋商机构，加强双边战略对话，扩大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卢武铉认为韩国将把日本作为未来东北亚共同体的重要伙伴，希望双方建立“在正确认识历史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卢武铉认为，不仅对北朝鲜，而且对日本也要采取“包容政策”（阳光政策）。日本川口外相称赞说：“因韩国新任总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而深受感动。卢武铉还主张，韩国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高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卢武铉的新政府希望通过亚欧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进一步强化地区合作，并拟倡议召开东亚首脑会议。

梅加瓦蒂

2001年7月23日，印度尼西亚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简称“人协”）提前召开特别会议，罢免了总统瓦希德，梅加瓦蒂当选为印尼第五任总统，也是印尼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任期至2004年10月。

梅加瓦蒂是在国家进入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上台执政的。瓦希德执政期间，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所希望的稳定和繁荣，相反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物价上涨，贪污盛行，政府信誉降到了最低点。她十分明白，她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依靠个人的力量更是无法完成。要带领国家摆脱现状，当务之急是组成一个既坚强有力、又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领导班子。为此，她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广泛征求意见，从各政党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众多候选人中精心挑选33人组成新内阁，并称其为“互助合作内阁”，目的是要求内阁部长们精诚团结，集中精力扎实稳妥地解决人们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总统，梅加瓦蒂深谙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她高举这面大旗，呼吁社会各阶层摒弃派系和个人利益，一切从国家大局出发。在组织内阁过程中，梅加瓦蒂任人唯贤，努力平衡各派利益，使长期以来争吵不休的党派关系明显缓和。军警派系在国家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相应重视，使他们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得到改善。这种上层政治精英间的和谐共事气氛对稳定政局至关重要，同时也使包括地区分离活动在内的社会冲突有所减少。她明确告诉那些分裂主义者，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支持，奉劝这些人重返社会大家庭，共同建设新家园，并强调政府绝不允许某个地区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理由从

印尼共和国中分离出去。另一方面，梅加瓦蒂明白，印尼出现分离主义倾向和地方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为此，她对于前几届政府对亚齐和伊里安查亚等地区的不公正待遇表示了歉意，承诺将采取措施，改善当地的状况。

梅加瓦蒂接手瓦希德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誓言反贪，以取信于民。执政伊始，她从自身做起，对家人亲属约法三章，严禁他们从事商业活动，也不允许有关部门向其家属提供任何经商的便利。与此同时，梅加瓦蒂还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此外，她还号召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也从自身做起，反对贪污腐化。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新政府的威望，使人们看到了建立一个廉洁高效政府的希望，政府的支持率明显上升。

将与东盟国家关系摆在印尼外交战略的优先位置，这是梅加瓦蒂急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其新政权尚未足月之时，从8月21日就开始她对东盟9个邻国的“旋风之旅”。在为期8天的访问中，梅加瓦蒂重申东盟仍然是印尼对外政策的基石。她希望印尼能够重新在东盟内发挥“老大哥”作用，使这个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她也意识到，如果国家经济得不到发展，印尼将无法重新在东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梅加瓦蒂表示，她将在两年半任期内把印尼治理好。此外，梅加瓦蒂还就打击国际恐怖组织活动同东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亦都表示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土成为亚齐分离主义和其他国际恐怖活动的基地。这些表态不仅为印尼放手处理亚齐分离主义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印尼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提供了保障。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后，中印两国外交关系于1967年10月30日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开始松动。1990年8月8日，在李鹏总理应邀访问印尼期间，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自当日起正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复交后，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002年3月下旬梅加瓦蒂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她就任

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华。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梅加瓦蒂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广泛共识。梅加瓦蒂还分别拜会了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和胡锦涛副主席，并与中国企业界人士进行了座谈。

在两国领导人双边会晤中，江主席对双方友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感到满意。他对梅加瓦蒂说，中国与印尼是友好邻邦，早在 50 多年前，阁下的父亲苏加诺总统就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为两国友好奠定了基础。江主席说，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发展与亚洲周边各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亚洲各国的共同繁荣是中国外交的优先目标之一。不断推进中国与印尼长期稳定的睦邻互信全面合作关系，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为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江主席提出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四点建议”：继续保持两国高层交往与接触，加强两国各层次的交流合作；扩大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加强两国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江主席还宣布，中方将向印尼提供 4 亿美元的优惠信贷，以促进双方之间的互利合作，支持印尼的经济建设。

梅加瓦蒂动情地说，她 10 年前曾率团访华，如今再次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此感到钦佩。她说，印尼与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加强，特别是高层交往增多，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相信印尼和中国的传统友谊应该也有潜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她感谢中国政府迄今为印尼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无私帮助。并说，中国对印尼的帮助是真诚的，充分体现了中方促进和加强中印尼关系的良好愿望。梅加瓦蒂完全赞成江主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提出的建议，对中方致力于两国友好合作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

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和梅加瓦蒂共同出席了中国与印尼关于印尼在广州和上海设立总领事馆的协议、关于成：立能源论坛的

谅解备忘录、关于经济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关于桥梁、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及中国石油天然气国际有限公司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协议的谅解备忘录等 5 个文件的换文和签字仪式。

梅加瓦蒂此次访华肩负着印尼政府和人民的重任，也带来了印尼政府和人民愿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愿望。她表示印尼愿与中方一道，尽快落实双方在各领域内的合作意向，抓住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机遇，推动印尼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友好合作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卡洛斯·阿罗约

2001年1月20日，卡洛斯·阿罗约宣誓就任菲律宾第14任总统。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强人是继科·阿基诺夫人之后菲律宾的第二位女总统。阿罗约出身显赫世家，学识渊博。

阿罗约十分注重国际间的合作。她认为，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只有多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快速发展，只有合作才能双赢。阿罗约尤其重视地区合作，特别注重在经济竞争中发挥地区组织的作用。

东盟把中国 and 该地区其他集团的崛起看做既是竞争刺激，又是市场机会。东盟和中国正在举行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将创造一个有着20亿人口，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市场。对东盟国家来说，明显的收益是扩大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出口额。这也将加强东盟成为投资者向中国销售的平台地位。预计这一协定将使东盟对中国的销售额增长48%。阿罗约说，“为了我们各国的生存和繁荣，我们需要更密切地实现一体化。我们需要从地区角度思考问题，并加强地区联系。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利益取决于该地区的命运以及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

阿罗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年致力于中菲友好，为发展中菲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10月30日，清华大学授予阿罗约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她为中菲两国友好及她在学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阿罗约认为，菲中两国关系“非常好”，菲中两国有着长达数世纪的经贸关系，菲律宾华裔曾为菲律宾渡过经济难关作出了很多贡献。目前华人在菲律宾的数量也很多，其中不少祖籍在中国福建省的菲律宾人仍然和老家保持着联系，这些有利条件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她还希望菲中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经贸关

系。2001年10月20日，阿罗约到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她说，上海之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第一次来上海大约是25年前，以后又来过数次，可以说目睹了上海这20多年来的变化。看到上海自身建设的过程是“令人难忘的”，尤其是这座城市还保留了很多过去的好东西，如恢复了外滩的原貌等。阿罗约还称赞在上海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组织工作。

“9·11”事件以后，美国需要菲律宾的合作，布什总统很想提升美菲关系，他盛情邀请阿罗约访问美国。与美国合作反恐怖，可使美菲两国双赢。更重要的是菲律宾既可借美国的威力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又可大大提升菲美关系，从美国得到经济利益。她的访问很快成行。阿罗约对华盛顿来说不是一个陌生人。她20世纪60年代曾在乔治敦大学学习经济，和克林顿是同班同学。上任以来，阿罗约一直以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著称，被誉为“亚洲铁娘子”。她对政敌毫不留情，十分果断地使用军事力量，这一点倒也与布什有些相像。不久以后，布什回访菲律宾，宣布美菲关系升级，菲律宾成为美国“非北约的最重要盟友”。这样，菲律宾将和澳大利亚、埃及和以色列等国一样，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美国先进武器装备。美国还将帮助菲律宾评估和增强其军事力量，实现军队的现代化。

然而，2004年7月的人质事件，严峻地考验了美菲关系，也极好地显示了阿罗约的外交胆略。这一年夏，伊拉克绑架人质事件屡屡发生，有好几个国家的人员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伊拉克武装分子于7月7日绑架了在伊拉克工作的菲律宾籍卡车司机克鲁斯，并要求菲律宾撤回其驻伊救援队，否则将处死人质。人质事件在菲引起强烈反响，是顶住民众压力继续驻军伊拉克，还是为保全人质安全而撤军，这无疑让阿罗约总统左右为难。但阿罗约没有犹豫，及时进行了一系列果断处置。人质事件发生后，阿罗约总统立即下令，暂停向伊拉克派出新的劳工，禁止菲公民到伊拉克旅游，准备赴伊工作的120名菲律宾人也停止出境。同时，阿罗约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研究人质安全问题，立即派遣特别小组赴伊与绑架分子进行谈判，并请求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利比亚和埃及等国穆斯林组织领导人帮助菲政府劝说绑架分子尽快释放人质。

美国多次敦促阿罗约坚定立场，没想到菲最后还是要撤军。美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说，布什对阿罗约感到失望，并称“菲政府的决定将向恐怖分子传达错误信号”。虽然撤军决定惹恼了美国等国，但却受到国内民众和政界的欢迎。特别是德拉克鲁斯的家乡人欢呼雀跃。参议员拉克松发表声明说，阿罗约向全国显示其为拯救人质生命而宁愿付出重大政治代价的决心，这是值得高度赞扬的。6名倡议政府撤军的众议员中，贝尔特兰还为美国对菲的态度感到愤怒，他称人质事件是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导致的，菲律宾人应对美国感到失望。阿罗约表示菲律宾仍将与其他国家团结起来，打击菲国内和国际的恐怖主义。阿罗约同时呼吁菲律宾的盟国能够理解，菲律宾处于一个特殊境地。与美国、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不同，菲律宾在中东地区有150万海外劳工，在伊拉克有4000名海外劳工，这是伊拉克人数最多的外国雇员群体。这些海外劳工的安全是她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她还表示，有些菲反对派和媒体夸张说，菲律宾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不是事实。她说，菲美之间有共同的政治传统，被历史永久联系在一起。

菲律宾是美国对伊战争和伊战后重建工作的坚定支持者。伊战结束后，菲政府曾向伊派遣200多人组成的特遣部队，并派送了大批菲劳工到伊工作。目前，菲约有51名军警驻扎在伊中南部，负责培训当地警察和维持社会治安。而菲在伊劳工则达4200人，这些劳工大多数是在美军营地从事清洁卫生、饮食等服务性工作。

弗拉基米尔·普京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于1999年12月31日作为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世界各国对他知之甚少。人们最初看到的普京是个冷峻严肃、沉默寡言的人。西方传媒因其有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又将他描述成“神秘莫测”的“冷面杀手”。

然而，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一开始就强调，他的外交战略为经济服务，其目标是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普京在积极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他明确提出，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俄罗斯将致力于以所有国家间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基础，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2002年，普京从国际形势和俄罗斯的国力出发，对外交政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提出了对国际事务进行“有选择地参与”的构想。

普京上台后奉行亲西方政策，但在俄罗斯切身利益上从不轻易让步。普京外交战略的中心是，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为主导，带动和改善俄罗斯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确保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逐步实现与欧洲的统一，让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最终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普京首先将俄罗斯定位为欧洲国家，积极同欧洲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协作关系”。普京上台伊始就强调注意同欧洲国家发展关系。后来又多次重申他的这一战略思想。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欧洲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俄罗斯的一贯立场是采取具体步骤实现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建立统一的经济区。2002年5月28日，普京同北约19个成员国的首脑签署了关于建立俄—北约理事会的《罗马宣言》，宣布俄罗斯与北约成了“平等伙

伴”关系。次日，普京又与欧盟领导人签署了俄欧关系 5 项原则声明。欧盟则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表示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普京在奉行亲西方政策的同时，主张维持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以增强俄罗斯的国力。普京特别重视亚洲，把它看做未来经济竞争的重点。

强调同中国建立牢固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普京的重要外交战略之一。普京一上台就高度评价了俄中关系。他说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和接触对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进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两国无论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层次”。普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定期互访，在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出兵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普京“特别关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希望两国在能源、高科技、太空等领域拓展合作，同时加强在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他全家对汉语、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兴趣都很浓厚。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学习中国武术，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开始学汉语。

加强同印度和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往来。目前，印度军队 80% 的装备来自俄罗斯。普京还对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持积极态度。通过采取这些举措，普京将俄罗斯的利益与苏联过去的利益连在了一起。

普京加强了同日本的往来，2003 年 1 月，普京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签署了“日俄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他还说：“包括两国首脑在内，一致认为应该加速领土问题谈判。两国将竭尽全力消除过去留下来的两国发展的障碍。”

敢于同“邪恶轴心”国发展关系。尽管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家，普京为了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仍然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

此外，普京访问了美国的另一个“死对头”——古巴，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 10 年的“停滞时代”。

普京上台后，就紧紧围绕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恢复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以神秘的微笑，矫健自信的步伐征服了世界。

普京频繁外访，以同世界各国建立普遍联系。普京的第一件事是遍访周边国家，目的是保证周边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普京说过，邻居无法选择，同他们只能和睦相处，尽管他们各不相同。普京还到过蒙古，这不仅是由于它跟俄罗斯有共同边界，还因为对聪明的政治家来说，国家没有大小或强弱之分。据称，他在执政的头 19 个月中出访了 60 余次，有 77 天在国外度过。有人形容，普京出国访问有如“紧急空降”。比如他在加拿大出席“八国会晤”，在那儿只待了 46 小时，来回要在飞机上度过 30 小时，而且时间正好黑白颠倒。然而普京深夜回到莫斯科后，第二天早上又飞到斯塔夫罗波尔去视察那里的水灾情况，连记者们也往往跟不上普京这种工作节奏。普京出国访问讲究实效，一般不安排参观游览活动。有人说他哪儿都去过，可是哪儿都没有玩过，不是他不想玩，而是他感到没有时间。但他的收获却远远大于欣赏美景。普京通过出访和会谈，解决了同德国存在多年的转账卢布的计算问题，使俄罗斯欠德国的债务从 90 亿美元减少到 5 亿欧元，而且其中的 3.5 亿欧元已经偿还。债务反正早晚要还，而普京却选择在德国遭受水灾后立即将钱汇过去，使古板的德国人对俄罗斯顿生好感。普京出访期间敲定的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计划，简直就是对未来投资，为后代挣钱。

普京自 2000 年在斯洛文尼亚首次会晤布什以来，就与这位美国总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布什喜欢看别人的眼睛，以此断定是否应该信任他们。普京是第一位被布什邀请到他的私人牧场做客的国家元首，两人以亲密的私人会晤取代了以往的繁复礼仪。普京赞扬“布什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是能力很强的政治家”。“他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仍将是好朋友，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存在分歧。”

普京为学英语，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成了好朋友。普京喜欢用英语同布莱尔交谈，他们还一起看过歌剧，一起在酒吧喝

啤酒开玩笑，还互相亲密地叫对方托尼和沃洛佳。

在 2000 年 8 月冲绳首脑会晤时，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未跟普京握手，但两人在圣彼得堡垂钓之后，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随着两人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立场的接近，两人关系更加热乎了起来。2003 年 2 月 10 日，普京赴法国就伊拉克问题协调立场，希拉克亲临机场欢迎，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如今，人们难以评判究竟是布莱尔，希拉克，还是八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谁跟普京更“铁”。普京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亲临金正日 61 岁生日庆典，并为他送去了生日贺礼。日本新首相小泉暂时还未闯入普京的朋友圈，因其一登上首相宝座就迫不及待地针对领土问题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要么全部归还，要么一点不给。普京为此而不急于跟小泉套近乎。普京让世界相信，俄罗斯愿意成为各国的伙伴。

托尼·布莱尔

在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首相布莱尔孤独地与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一起面对群雄的“口诛笔伐”。随后的一年多里，唐宁街却成为了“接待中心”。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纷纷造访英国。以“行动”与“参与”为准则的布莱尔也积极回应，在上述各国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布莱尔的外交周旋，英国巩固并发展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恢复了在欧洲的中心地位，发展了与俄罗斯“良好的政治关系”，建立了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了与日本、印度的友好关系。尽管布莱尔在国内总也关不上“伊拉克门”，但不能不承认，伊战后布莱尔在外交上收获颇丰。这主要得益于布莱尔的外交谋略：与强为伍，重视大国；利用优势，巧妙制衡；审时度势，借势获利。

2003年3月20日，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爆发。就在这一天，布莱尔就英国军队参战发表了讲话。从此，布莱尔主动跳上布什的战车。然而，他显得内外交困、声名狼藉，心中藏有不少苦衷。尤其是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开战后，接连几天都有英军伤亡的消息传来。路透社记者说，英军的运气太坏了。英国首相布莱尔每天在电视上露面，都会对阵亡英军官兵表示哀悼。与美国总统布什不一样，布莱尔是在国内强大的反战压力下把军队送上战场的。军队伤亡在国内形成的压力，是开战后布莱尔面对的第一个难题。美英军队对伊拉克的“震慑”轰炸，显示的是武器优势，英国无人喝彩。虽然，战争前夕布莱尔政府的参战决定得到了议会的支持，但英国国内民众一直在指责政府的行为缺乏国际法的支持、缺乏道义的支持。因此，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刻起，布莱尔就背负着沉重的道义压力。

伊战后，尽管在国内深陷“伊拉克门”，布莱尔仍坚称参与伊战是英国的正确选择，表示如时光倒流，他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并应美国要求继续向伊拉克增派了军队，与美国一起敦促北约在伊拉克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还为美国的单极主张游说。当然，英国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赞成美国，但布莱尔认为与美国对抗并不能解决分歧，只能“通过合作输出影响”。在英美分歧严重的关塔那摩关押的英国俘虏以及欧美贸易争端等问题上，布莱尔多次私下向美国坦诚直言，使布什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可以说，正是由于布莱尔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及其明智的外交谋略，使英美特殊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97年布莱尔上台之初，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布莱尔认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均在欧洲，英国只有保持在欧盟的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对美国产生影响，英国必须尽量融入欧洲，影响欧洲。“积极参与，诱压结合，恢复在欧盟的中心地位”是布莱尔对欧洲的外交谋略之一。由于深受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格累斯顿的影响，布莱尔希望在外交上采取主动行动造势而不是被动接受定势，这一思想在其对欧盟的外交中得到充分体现。布莱尔明确表示，英国要参与欧盟政策的制定，而不能像以前一样“慢半拍”，等别人制定政策自己来执行。虽然伊战使英国在欧盟内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布莱尔也被指责分裂了欧洲，但他仍坚持执行既定的政策，并采取诱压结合的外交手腕，很快使英国重新回到了欧洲的中心。在欧盟自伊战以来涉及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布莱尔均使英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参与精神。他主动推动欧洲防务发展、参与欧盟宪法草案磋商、提名彭定康担任新一届欧委会主席、要求英国财政部对英加入欧元区一事进行评估。诸如此类的主动行动充分体现了布莱尔对欧盟的重视，改善了英国在欧盟中的孤立地位。与此同时，布莱尔还看准法德发展欧洲防务的急切心情，主动妥协，部分满足了法德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欧盟内部的分歧，恢复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但在涉及英国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上如欧盟内部税收、社会法案的否决权问题等，布莱尔寸步不让，迫使法德最终妥协，从而在欧盟深化与

扩大的时刻，维护了英国的利益。

“利用优势，巧妙制衡”，是英国传统的外交谋略，通过促使各种对立力量的分化组合消弭增长，使英国占据有利位置。布莱尔深谙此道且奉行不渝。

为了推动恢复联合国权威，约束美国单极倾向，布莱尔多次强调国际合作在英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认为依据国际法的多边合作是使英国影响最大化和解决全球面临问题的最好方式，而联合国是多边合作的中心。但是，布莱尔也清楚地看到，美英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长此以往，不仅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联合国的约束，美国的霸权思想和单极倾向将不受约束地无限膨胀，并最终影响到英国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恢复联合国权威成为伊战后布莱尔最为紧迫的外交目标之一。布莱尔频繁地在美国与法俄之间穿梭往来，促进各方退让妥协，最终与布什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关于伊拉克问题的新决议，恢复了联合国在伊拉克政治、经济重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联合“新欧洲”，在欧盟内牵制法德也是布莱尔使用的外交谋略。在今年6月欧盟宪法草案及新一届欧委会主席人选等关键问题上，布莱尔联合波兰等“新欧洲”国家，在欧盟内对法德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不仅在税收和社会法案等问题上否定了法德力主的多数表决制，而且否决了法德力捧的欧委会主席人选。

“无势无以成事，用势可成大事”。布莱尔在他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充分运用了这一谋略并获益匪浅。伊战使英与法德关系严重受损，但伊战同时又为英与法德改善关系埋下了伏笔。布莱尔对布什的坚定支持赢得了布什的信任，增加了对布什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法德清醒地看到美在伊战中表现出的决心与实力，不得不承认自己虽有制美之心，却无制美之力，现实的选择只能是继续与美国合作，而在欧洲能与布什政府直接对话的只有布莱尔一人。

布莱尔继承了英国平衡务实的外交传统，结合当今国际政治

现实，精心思谋，妥善策划，在国际外交风云变幻中有力应对，使英国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主角之一，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增加了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实现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目标。当然，谋略只是外交成功的因素之一，实力才是外交成功的真正后盾，因此伊战至今，英国外交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有许多时候力不从心。

康多莉扎·赖斯

1954 年 11 月 14 日，康多莉扎·赖斯出生在伯明翰。她的父母都是思想开放的人。他们很早以前就告诉她：你什么都可以做。在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父母都已经 30 多岁了。实际上，约翰·赖斯希望生一个男孩，因为他想以后和儿子共同分享他的爱好：足球、棒球和篮球。

但是赖斯出生没多久，她父亲就像喜欢一个男孩一样喜欢上了她。对她的父亲来说，她很特别。他很自豪地宣布：“康迪（康多莉扎的昵称）不是属于我们的，她是属于上帝的。”好像是他的第六感告诉他，康迪将拥有飞黄腾达的职业生涯。他称她是“小明星”，在她父亲心里她永远都是小明星，即使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超级明星。

赖斯的母亲也从一开始坚信她的女儿拥有神童般的天赋。很早以前赖斯在巴吞鲁日南部的一所大学做过一次心理测试。测试结果更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我知道，我的孩子是个天才。安吉兰娜希望她的孩子日后成为一个钢琴家，前程锦绣，所以她给她的女儿取名为“康多莉扎”。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意大利语的音乐术语（condolcezza），意思是“甜美地弹奏”。

赖斯的父亲曾任丹佛大学副校长，母亲是小学音乐教师，姑姑是维多利亚文学博士。优越的家庭环境使赖斯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教育，她 15 岁时便成为丹佛大学的学生，学习英国文学和美国政治学。她所崇拜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是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克贝尔教授。在克贝尔教授的引导下，赖斯将东欧和苏联作为主要研究领域。19 岁时，赖斯获得丹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之后，她又分别于 1975 年和 1981 年获得圣母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丹佛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政治学博士学位。1981 年，年仅 26

岁的赖斯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讲师。

1989年1月，刚满34岁的赖斯出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开始了从政生涯。作为布什政府中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赖斯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4年期满卸任后，赖斯进入胡佛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1993年，赖斯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她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也是该校第一位黑人教务长。

在2000年美国大选时，赖斯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为布什出谋划策。布什当选总统后任命赖斯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她一直是布什总统的得力助手。2005年1月出任国务卿，她是继克林顿政府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国务卿。

作为小布什的“首席演奏员”，康多莉扎·赖斯看来已经精通了这项精密的技巧，并且在错综复杂的外交世界给予小布什指导。